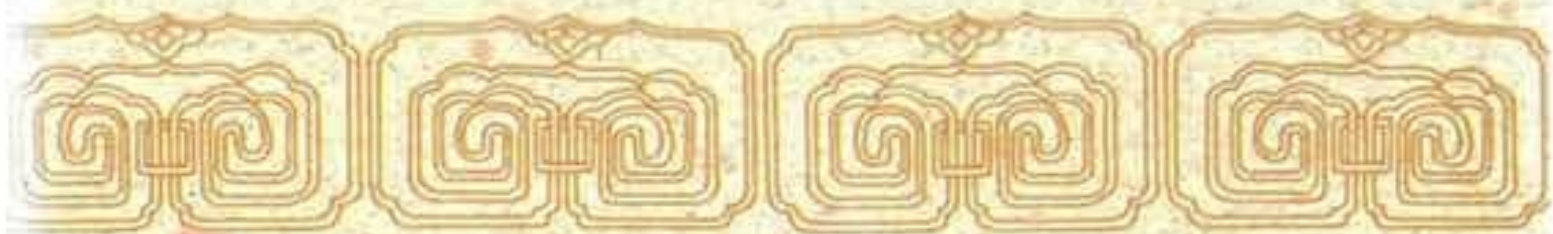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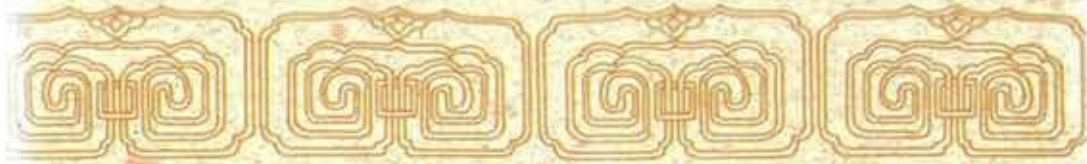
真意集

葉明勳
著



真意集

葉明勳 著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引言
4. 新聞篇
5. 吾道力行方有功
6. 新生報與我
7. 任內最難忘的一件事
8. 不滅的燈
9. 三種力量的凝聚
10. 元首與記者
11. 紀念篇
12. 爲有源頭活水來
13. 慈湖似應立碑
14. 典型始信布衣尊
15. 天地能知許國心
16. 雜感篇
17. 驚濤歷盡看台灣
18. 思前賢，看今朝
19. 卓越、遠見、天下

20. 遐思
21. 談大老與大器
22. 容量與民主
23. 思往事 論千秋
24. 吾國與吾黨
25. 附錄
26. 不容青史盡成灰
27. 後世忠邪自有評
28. 聞道長安似弈棋
29. 誰知明月照溝渠
30. 初履斯土
31. 多少蓬萊舊事

引言

我在台灣住了將近五十年的多難歲月，居於此，憂樂亦於此。數不盡的人間變數，從風雨飄搖到歌舞昇平，無不盡收眼底，如今雖已成為陳迹，但因人在此土，心亦在此土，發於休戚攸關之情，先後留下了一些紀念性的文字。其中所包括的：以新聞界而言，自己雖是退休多年的老兵，仍有很多的友情、事物環繞著我，而我也有一份執著之愛，令人關懷。這個事業發展在現實的大千世界中，不僅長江後浪推前浪，而且也閃爍了百花齊放，爭奇鬥豔的光芒和活力。偶有抒懷之作，都是出於肺腑真切之情。以人際情誼而言，基於歷經世變，目擊滄桑，從碩宿到新生代，從廟堂到布衣，我曾以概述天寶遺事的心情，略述我們何者當須飲水思源，何者足以見賢思齊，亦多發於至誠之作。以感時撫事而言，有時為應各方的厚意相囑，勉為撰成若干短文，散見報章，雖敝帚不足以自珍，然皆為反映現實，激於良知之作。這些多年舊作，如加整理，不覺累積盈篋，雖無龔定庵那種「安排寫集三千卷」的弘大氣概，但想到陶淵明所說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實為自己心情的寫照，因為字行之間，無不存在著真實的我，乃以真意兩字命名彙印成冊，為自己留下至誠至情的一面，殆亦此情堪待成追憶，取以會友，不亦知我之無偽乎。

葉明勳自識

新聞篇

吾道力行方有功

——九一記者節五十周年感懷

我廁身於新聞界從服務中央社開始來算，轉眼已經五十年，而九一記者節的誕生至今轉眼也到了五十周年。所以，逢此佳節，撫今追昔，自己雖屬老兵之列，未免感懷特多。

五十年來，台灣新聞機構，與我最具歷史淵源的，一是中央社，一是新生報。中央社已故首任社長蕭三爺（同茲先生），對我的一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長者，他的光明磊落風範，與恢宏謙沖氣度，無不足以令人見賢思齊。過去胡適之先生於中央社在台慶祝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茶會上，便曾蒞會說過：「如果要我以政府當局的立場頒發最大的勳章，我會發給蕭同茲先生」，其推崇至此，我們可知蕭三爺對新聞事業的貢獻與建樹。中央社因有蕭三爺的領導，視部屬如子弟，推心置腹，關護備至，彼此之間便瀰漫著極為濃厚的人情味。當年很多有為的青年，大學新聞系畢業後，踏入社會的第一道門，多數就是中央社，而後歷練成為成功人物者，不乏其人。無論時間長短，他們談到中央社仍然未能忘情，對蕭三爺仍然存有服膺領導的至情。此中因素，實由三爺崇高的風格與大公的精神，有以致之。所以，我離開中央社雖已超過了四十年漫長的歲月，但中央社的傳統精神，仍然環繞著我，中央社很多的好友，我與他們那條互通訊息的線始終維繫著，或以傾心之談，或以盃酒之歡，彼此

彷彿還是同在一條船的人。一旦中央社有事，自然也特別投入了風雨同舟的情誼。

至於新生報，它的前身就是日據時代總督府所辦的台灣唯一的日文大報——台灣新報，台灣光復後，始由政府接管，派台灣省已故首任副議長李萬居先生為社長，也成為唯一的省營大報。當時台灣人口不到六百萬，該報的發行人數則為十八萬份。萬居先生長我十多歲，我們與前國大代表林忠三人，都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由陪都重慶首批同機來台接管新聞機構的人員。萬居先生接管台灣新報（即新生報前身），林忠接管台灣廣播電台（即中廣前身），而我是接管日本同盟通訊社台灣支社，後來即改隸為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新生報雖具有雄厚的人力，財產資源，但光復後改為中文版，中文的人手一時便有捉襟見肘，不足應付的感覺。所以，創刊號問世後，與我們同機來台的大公報李純青、費彝民，掃蕩報謝爽秋，中央日報楊政和等新聞界碩彥，包括自己在內，都成為新生報撰寫社論的臨時工。新生報董事會成立後，我忝為董事之一，至今四十多年仍然保持這種長達將近半世紀的關係，目前新聞機構中是很少見的。

但是，最近半年，已負盛譽的中央社與新生報，卻因報導的內容與標題的遣詞，不為我們的民意代表所認可，兩位社長竟被迫登門道歉與在議會上被謾罵，以求息事寧人，為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充滿傷痕的一頁。這個問題的癥結，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太重視民意代表的權勢，一切以民代掛帥。他們可以不負言責，咄咄逼人，大放厥詞。而記者倘使筆下偶有不慎，觸其逆鱗，便不得不默默的俯首認

罪，備受言詞鞭笞之苦。這是歐美各民主先進國家所未見，而在台灣的民主殿堂，卻是司空見慣，能不令人感慨係之，新聞自由云乎哉？

像這種對新聞界構成傷害的事件，竟發生於兩位資深而學養俱豐的社長身上，實非意料所及。當時新生報的標題只含有指責的字樣，但社長卻被迫到省議會的大堂，如受審問似的遭到某些民意代表的肆意羞辱，潑水謾罵，幾至無地自容。究其原因，無非報社的經費預算，議員們握有否決扼殺的大權，為顧全大局不得不吞聲受辱。至於中央社往日雖有光榮的歷史，但時至今日，改制問題輾轉稽延，非迅謀解決不可，關鍵也在某些中央民代的一關。若干民代因對中央社所發佈的某則新聞不滿，社長為顧全大局，便不得不率同一干主管登門道歉，其所祈求者，無非只望改制問題不為袞袞諸公所阻撓而已。

過去記者之所以為人敬重，尊為無冕之王，乃是由於記者的言論與報導，對社會具有教育功能，端正風氣的貢獻。於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們便奉為記者應有的典範，記者亦以此自重自律。但在今日，社會的價值觀念改變，各界給予記者的定位在那裡？記者的處境，有時真是難以想像。記者於正義真理的大纛之下能否堅持原則，堅守立場，不遷就於現實被迫的情勢，已非記者憑一己的情操所能決定。陶淵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千古傳為佳話，但他所代表的只是個人的意願，記者所代表的卻不是個人，而是整體的新聞事業的精神。所以，我們殷切的期待我們這個進步的社會，從廟堂之上以至里巷之間，尤其是民主殿堂中的袞袞諸公，對記者同仁們給予應有的尊重，這是像人權在民主國家一樣的應該受到尊重。新聞事業的可貴

在那裏，記者的定位在那裏，我們都不容一味無知的予以否定。尊重記者，了解記者，多接近，多溝通，在我們這個民主社會，無論對政府、對大眾、對民意代表，都是有益而無損。記得陸放翁自規詩有「此心少忍便無事，吾道力行方有功」的詩句，無異是今年記者節我們心情的寫照，吾道力行方有功，怎樣的力行，怎樣的貫徹新聞自由的精神，這是我們自我提升應有的期許與省思。

(原載八十一年九月一日中國時報)

新生報與我

在臺灣發行的各報中以新生報的歷史為最久，而我與新生報的交誼也是歷史最久的一人。追溯三十四年創刊之日開始，我即參加董事會，至今瞬已四十年，仍為董事會一份子，四十年的董事歷史，求之當世，恐亦不可多見。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據時代臺灣總督府出資所辦的《臺灣新報》，擁有十八萬份的發行人數，而且是一份唯我獨尊的官方日報，物質條件自然比較充裕。臺灣光復，規定自屬於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所接管，也就是後來改組為省政府的新聞處。我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首批偕同政府人員到達臺灣的，當時的身分是中央社特派員，同行的新聞界人士，計有陪都重慶中央日報楊政和、上海大公報費彝民、重慶大公報李純青、掃蕩報謝爽秋，與準備接管廣播電台的林忠諸氏，以及後來出任新生報首任社長的李萬居先生。臺灣受降典禮既定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接管臺灣新報的新生報（報刊為于右任先生所題，以示新生之意），自然必須同日發行創刊。以匆匆半個多月的時間，一份完全採用日文的日報，要以嶄新的面目，更新為中文日報，與臺灣同胞相見，這是何等倉促艱難的事。於是上述的新聞界人士，從社論到撰稿，無不義不容辭的為新生報而出力，當時為顧慮台灣同胞閱讀中文報紙，尚難普遍的適應，權宜之計，不得不暫時附刊部分的日文版。我的職責，不但急需儘速的將臺灣光復最新的消息向全國報導，而且還須接管日本同盟

通訊社的業務，建立中央社臺北分社，發行新聞稿，同樣的也須採用中文、日文兩種不同的稿件，人手設備，都在極端的欠缺下進行著。而這些新聞稿，提供的對象，便是以新生報為主，新生報也以此視為新聞的主要稿源。所以，彼此合作往還，無日無之，新生報與我，幾乎視為一體，形成了骨肉相連的情緣。

當時長官公署當局的構想，臺灣只需一份代表政府溝通民意的新生報便已足夠，不希望另有外來的報紙發行。此事後經黨中央陳立夫、許孝炎先生熱心的奔走，當局終於不再堅持。於是，三十五年乃有中華日報在臺南創刊，但是，中華日報的先天條件，遠不及新生報，辦報缺乏財力物力為其後盾，難免如無米之炊。新生報於此時卻能伸出援助之手，將臺南的房舍、印報設備，撥交中華日報使用。社長李萬居兄當時能從大處著眼的見識與精神，不但如今身在異邦的中華日報首任社長盧冠群兄仍在感念，就是我這個第三任的社長，也未能忘懷他的支持。天道無常，斯人不可復見，思之黯然。

大陸淪陷的前後，臺灣形勢險急，人心憂惶，而此時昔日多少的風雲人物與龐大的機構都紛紛的渡海而來此。各報中如具有全國性的、代表性的中央日報，以及異軍突起的民族報、全民日報等都相繼的在臺與讀者見面。新生報由日文轉型為中文僅止數年的日報，它的發展，顯然受到了外力的衝擊。而讀者則又多以好奇喜新的心態去欣賞各報，於是新生報在潛意識中無疑的如失去平衡，憑添了一份失落感。雖然，這是短暫的，這是如過眼雲煙，瞬息即逝的，但亦足以顯示辦報的艱辛是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歷程。事實上，新生報純然是屬於省營的日報，應該有它特

殊的立場與風格。標新立異，爭奇鬪豔，以博取讀者的喝彩，都不是新生報所欲為，也不是新生報所應為。可是人類的情感，往往最容易接受環境風氣的干擾與影響，有時真會茫然的淡忘了自己所走的方向。就像欣賞一場精彩而劇烈的球賽，置身其間，很難永遠的保持著超然的冷靜態度是一樣的。新生報與我，具有四十年的情誼。所以，我的關懷因亦最切。

如今，新生報經歷任社長與同仁們的努力，如經過風雨洗禮後的晴空，萬里無雲，碧澄悅目。立論的正確，報導的翔實，取材的宏富，編排的精巧，無不燦然可觀，獨具風格，日新又新，而且已確定了自己所應走的方向。臺灣新聞報，原為新生報南部的分版，如今也已獨樹一幟，斐然有成，為臺灣南部讀者提供了不負眾望的服務。惟有耕耘，始有收穫，信非虛語。

回首四十年的歲月，多難的國家真不知遭遇了多少次的變故，但是，臺灣由動亂而安定，由安定而繁榮，終於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燈塔。新生報對於社會自有其不容抹煞的貢獻。而且為國家扶植養成了不少的傑出人才；他們有的至今仍堅守著自己的崗位，有的雖已易地而奉獻，但仍以新聞事業為其終身職志，有的新聞崗位雖為其起點，卻已發展到另一領域，放其異彩，都是歷歷可數，有目共睹的事實。我以四十年的老友，謹在此為新生報的發展致以至誠的祝福。

(原載七十四年九月四日新生報)

任內最難忘的一件事

我擔任中華日報第三任社長的時間，是在民國四十年七月一日以迄四十四年七月一日，歷時共四年。

當我到任之初，還是像筆路藍縷的時代，員工們欠薪達三個月之久，急待補發，第一天晚上到中山北路編輯部小坐，褲子也被那條冒出彈簧的舊椅子戳破了。

如說任內最難忘的事，就是到任前承先總裁 蔣公的召見。這不是以榮寵自炫，而是與中華日報後來發展的方向是有關的，而且顯示，蔣公決不是堅持己見，不易接納下情的。因為中華日報創刊後，北版經營的狀況，始終虧損，南版則蒸蒸日上，當時的問題很多，而且台北已有中央、新生等大報，佔盡風光。蔣公認為如在台北再有一份黨報，不易為人重視，不如放棄北版，改為重點發展，將台南的中華日報南版易名為《農民日報》。但是，當時我卻提出相反的意見，因為改絃易轍，勢將成為地方性的報紙，而且業務編採各方面都有實際的困難。蔣公便同意我的意見，要我試辦看看。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真相外人並不是很清楚的。

另有幾項興革，也與中華日報後來的發展有關，這裏並須附筆一提：

（一）社論、副刊在南北兩版統一刊出，樽節開支，社論曾請名家楊幼炯、潘公弼、黃雪邨先生等主持。

(二) 增闢體育、娛樂兩版，副刊側重專欄的連載，以期風格上求其突破。如陳定山先生的〈春申舊聞〉等都先後刊出。

(三) 統一人事財務管理，南北兩版人才交流調用，財務則作統一分配。

(原載七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中華日報)

不滅的燈

兩年前，中華日報創刊四十周年時，我曾寫了〈任內最難忘的一件事〉一篇短文。

那篇短文中提到我在民國四十年夏接任第三任社長以前，先總裁 蔣公曾予召見。當時中華日報的處境，北版的經營，虧損累累，而南版的業務則蒸蒸日上。 蔣公認為如在台北再辦這份報，不易為人重視，不如放棄北版，改為重點發展，將南版易名為《農民日報》。我基於中華日報發展的立場，便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如果改絃易轍，勢將成為地方性的報紙。 蔣公欣然同意我的建議，要我去試辦看看。這是未為外人所知而塵封已久的往事，從這件事上，顯示 蔣公並不是堅持己見，不易採納下情的人。而在三十七年後的今日，中華日報果然不謀而合的實踐了 蔣公的昭示，回復到他老人家所指點的道路。追懷他老人家的洞燭機先，冥冥之中，如有一盞永遠不滅的燈在我們的心上照耀著、指引著。

另有一件事，也與中華日報的發展是有關的，就是三十七年以前的今日，組織上曾有一道分水嶺，前此設有副社長，董事會與社長副社長如在集體領導，雖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但有時未免事權難臻統一，步調難趨一致。於是，當連震東先生任董事長時，便不再設副社長，董事會責成社長全權負責。中華日報以後的發展，就是從這條路上邁步而往，由筆路藍縷以至新建大樓，規模大備。光明的前途，也像有一盞不滅的燈

永遠在照耀著、指引著。

(原載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華日報)

三種力量的凝聚

——中國時報創刊四十周年有感

我以忝列爲新聞界前哨的老兵，到台灣已經有四十六年之久，四十六年來，國家由風雨飄搖中而趨於安定繁榮，社會由寧靜的農業轉型而為尖銳的工商業快速的發展，一切都在急遽地躍升著、蛻變著。以新聞界來說，由台灣光復的初期，而至政府遷台，民間報業的崛起，由限制發行，而至報禁開放，順應時代的潮流，乃有今日羣雄並起，百家雜陳的盛況，自然這是很可喜的現象。

因爲社會一切的建設或成長，惟有競爭始有進步，惟有邁向進步始可臻於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境界。這是文明進步永恆不變的法則，也是我們共同所期待的嶄新風貌。

但是，報業有異於別的行業，它有光華絢爛的一面，也有艱辛苦澀的一面。它不可以一日鬆弛，也不可以片時疏忽，隨時都需要如拉緊著弦的弓，弓上的箭，不可以亂發，不可以不發，一點都不容有半點的差錯。所以，已故報業先進潘公弼先生，曾調侃的說，報紙成功的歷史只有一天，可謂一語中鵠。就是說這一天中如果不奮發圖強，做好一切的準備——包括言論報導發行等方面，這份報紙便自然不爲讀者所支持，也無法與讀者繼續相見了。

中國時報創刊至今欣值四十周年紀念，如以一天的歷史來計算，就是累積一萬四千六百多天的歷史，這是一份極為成功、極為可貴的紀錄。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與我交誼逾四十年，他對這份報紙所秉持的執著精神，與所花費的艱澀心血，我認為至少具備了三種力量，他的成功，就是這三種力量的凝聚。三種力量，一是魄力、一是毅力、一是定力。魄力，就是顯示具有前瞻性而不為人所見的遠識，與人所不能而能為之的不畏困難的精神，而且胸懷寬廣，用人惟賢，廣攬有識有學之士，以獨特的風格，別出心裁的出現於讀者的面前。否則，如無以取勝，便不易為廣大的讀者羣所注目，也不易獲得讀者們普遍的掌聲了。至於毅力，乃是任何事業不可缺少的成功因素，無視艱難，無視阻礙，鏗而不捨的持之以恆的努力。中國時報從創刊到無遠弗屆的廣設發行網，它的歷程，過去便曾有一段崎嶇而漫長的任重道遠的道路，如果無此毅力不能以一貫之，絕沒有後來如登泰山石級愈走愈高的境界。目前中國時報所追求的方向，是致力於導向讀者接受開明理性的政治理念，目標顯明，屹立不易。而其本質內涵則為提倡民主自由，冀以共同促進台灣的建設發展，成為時代前端而為大眾所必需的喉舌。實現這種理想，就是需要定力，始能拓展抱負，同心同德，實踐力行，充滿自信的為勾勒其所設計的鴻圖大展而竭其才智。

我是中國時報的忠實讀者，天天見面，這份情誼，也持續了四十年的歲月而延綿不絕。它的成功，無不是翹首以待的樂觀其成的。

(原載七十九年十月一日中國時報)

元首與記者

記者被尊為「無冕之王」，這種榮譽，時至今日，我們能否受之有愧，這是很值得檢討的嚴肅問題。老報人成舍我過去曾以孟子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視為標準報人的風格。而今有些記者竟被人謔稱為製造業、相命業、屠宰業，然乎否耶，我們需要自省、自律。

這裏，使我想到昔日兩位國家元首對記者的重視，一位是先總統 蔣公對大公報張季鸞，一位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對中央社任玲遜。這些往事對新生一代的記者來說，應該知所見賢思齊。

大公報戰前是以言論公正聞名於全國，即由張季鸞主持筆政，重要社論，多出於張氏之手。他以憂時憂國的超然立場，與真摯的文字，發為正義之聲，成為當時輿論重鎮。西安事變時，該報曾以張氏所撰社論大量空投西安，力斥其非。謀國之忠，以迄抗戰，未改立場（大陸變色後，面目已非）。抗戰時，蔣委員長對張氏甚為禮遇，常邀張氏單獨共餐，暢談國事，因深知政府的立場與動向，為文遂能深入而恰如其分。張氏作古後，蔣公視察西北時，曾往其墓園憑弔，新聞界之受元首如此重視，殆無第二人。然張氏生前從不談委員長對我如何如何，仍然保持著布衣傲王侯的清高風格。

任玲遜為中央社華盛頓特派員，抗戰時，因在白宮行走，常與羅斯福總

統共進早餐，綜談天下大勢。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我國訪英團（包括王世杰、王雲五、胡政之、杭立武等）於訪英謁邱吉爾首相後，曾轉道赴美訪羅斯福，羅與胡政之（大公報負責人）慷慨其言：「中國記者任玲遜在美所做之事，對你們國家的貢獻，可能勝過三位大使。」一時傳為佳話，而任則從未以此自炫。

任玲遜因與羅斯福常接近，所獲有關戰事的資訊，很多以密電提供參考，由中央社總社轉呈最高當局（能見此者僅限黨政高層人士）。這種電訊，常為我駐美使館送回資料中所未見，有之亦在半個月到達。但任亦從未以此居功，或自稱其能。這種風格，令人可敬可佩。

以上所說的啓示是：記者之受尊重，需要政府方面經常與之接近、瞭解，否則，只有增加隔閡，對政府有損無益。而記者欲以提升層次自許，本身尤須先加充實與檢討。

（原載八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自立晚報）

紀念篇

為有源頭活水來

——賀台視創立三十周年

台灣電視公司於民國五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成立，轉眼已過了三十年的悠長歲月，我應當時董事長林季丞（柏壽）先生之邀，出任顧問，參預其事，至今也達三十年之久，在台視很少像我這樣從創始到成長的老兵。

如果談台灣的電視歷史，無疑的當以台視開播之日開始。早此之前，先總統 蔣公便認為設立電視台是適應時代的潮流，早應作此準備。但因政府方面有人認為此非當務之急，持不同的意見，以致幾經波折，迄未實現。後來 蔣公責成當時台灣省主席周至柔先生從速辦理後，始由省府進行籌劃。當時向周主席推介或角逐董事長的人，雖皆為一時之選，但他默察社會實際情勢，認為台視董事長一職，以台灣碩宿林季丞先生最為適宜，便邀我先去商談，說明此意，希望我能代為轉達。季丞先生是我的長輩，人皆尊稱為林四爺。林四爺並未答應，以本身事忙推辭。未幾，美國國務院邀周主席前往訪問，機場送行時，林四爺也在其列，周至公特地邀他到貴賓室去晤談，重申此意，言辭十分的懇切。當時林四爺仍未應允。不料周至公到美後，又特地致電省府秘書長郭鏡秋

（澄），很堅持的要他仍去請林四爺出任台視的董事長，郭秘書長謹慎將事，惟恐不成，便邀林四爺的摯友中央社故社長蕭三爺（同茲先生）

與我，三人同往林府面謁林四爺，再三說明周主席仰仗的殷切，林四爺至此才勉強的答應了挑起這個重擔。後來林四爺於七十五年逝世，舉行追悼會時，周至公雖以抱病之身，不良於行，還是坐著輪椅前去弔唁，默默地望著遺像，這種以生死見真情的高風亮節，令人為之感動不已。

當時林四爺挑起這個重擔後便詳加策劃。台視創設之初，資本額只有新台幣三千萬元，而且還有百分之四十是日本、富士、日立、東芝等日商四大公司投資的。這是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自然一切都是需要開拓的、創新的。經營未久，便見大量的虧損。當時林四爺的構想，希望我方與日商都能共同的增資，再謀發展。此事經當時台視周總經理天翔親自前往日本洽商，不料日商缺乏遠見，並未同意。周總經理在日馳電告知以後，林四爺幾經考慮，便決定在台泥大樓邀請了台灣工商界名流許金德、陳逢源、林熊祥、辜振甫、何傳、王雲龍、杜萬全、林玉嘉諸先生，說明台視所面臨的困境，而且特別指出電視在台灣仍是極有前途的事業，困境只是短暫的，希望各人鼎力支持，共襄盛舉。於是匯集了各方的力量，再增資三千萬元（資本額合計六千萬元）。台視至此，始有民股投入。像這種欲挽狂瀾於既倒的作為，如果缺乏信心，缺乏魄力，誰都不敢輕易嘗試的。後來事實證明，果然應驗了林四爺所說的話，林四爺無愧掌握最正確、最明智的抉擇。一年後，台視因業務蒸蒸日上，突破困境，一變而為開創了屬於它自己的新的領域，大露曙光。於是再將盈餘撥出四千萬元，資本額共增至新台幣一億元。台視經此握算持籌以後，第二年，盈餘便迅速地高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不但彌補虧損，償還債務，一切困難，自然也都隨而分別的迎刃而解了。電視從此在台灣閃爍著前所未見的光芒。其後數年之間，乃有中視、華視的繼起，踵

事增華，爭奇鬥豔，與台灣的經濟繁榮，相互映輝，形成了後來所發展的萬紫千紅的局面。遙想當年，台視如非林四爺這種高瞻遠矚，扭轉乾坤，撥雲見日的領導，後來的演變情形，誰也無法逆料的。

林四爺至六十五年以年老堅辭董事長的職務，並將台視所贈送的酬勞金新台幣三百萬元，轉贈與台灣省政府社會處，作為福利基金。這種博施廣益精神，外人多不知其事，頗有典型在夙昔之感，令人倍增無限的懷念。

胡適之先生過去很愛引用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詩句，如今思之，正是台視發展過程的寫照。我們傳統的觀念，對於任何事業，都是很重視飲水思源。台視的源，就是歸功於林四爺的苦心擘劃，後來演變而成，台視的氣勢，乃有或如長江黃河的浩蕩，或如五嶽千山的奇偉，竭造物之美，展現於我們的國土之上，為社會教育開拓廣泛的知識領域，為社會大眾充實多彩的生活視野，也為業餘休閒帶來了雅俗共賞的豐富資訊，這是前所未見的時代產物。

林四爺雖為台視奠下了百年永固的宏基，但是後來不斷的創新求變的發展，還是不能不歸功於繼任的許董事長金德、陳董事長重光，與歷任總經理周天翔、劉侃如、石永貴、王家 的同心合作。台視的同仁們，三十年來，前後何止千人，大家彼此都能榮辱相與，憂患相共，持續努力，因而能有此碩果呈獻於大眾的面前。抑且，我們不容忽視台視有兩大支柱的力量：一是制度，一是人才。此兩者互為因果的，沒有完善的制度，便無以公平、公正的選拔卓越的人才，這些人才，如不經考試制度的考驗，便無以突顯、發現他們的才華學殖。司馬光所謂「為治之

道，莫先於用人」，台視的治，首先就是羅致好的人才，而這些人才都是從考試制度中得之。歷任總經理雖各有其獨特的長才與遠見，但都以台視之心爲心、台視之榮爲榮，堅守這種制度，唯才是用，故能卓然成其大，對社會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

回顧台視的長成，確如「爲有源頭活水來」，資本額從新台幣三千萬元，現已增至十二億元，員工從一百七十人，現已增至七百四十餘人，而其業績從龐大的營業額來看，亦非人所能及，此三者足以引爲自慰。但是，自慰不是自滿，也不是自炫。因爲這是不進即退、日新又新的事業，惟有奮發自勵、精益求精，始可邁向更遠更長的理想之路。值此紀念佳節，欣感之餘，心之所至，願以此短文預祝之。

(原載八十一年四月廿七日中國時報)

慈湖似應立碑

——紀念先總統 蔣公一百晉六誕辰後建言

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是先總統 蔣公一百晉六的誕辰紀念日，有人謁陵回來，與我談起慈湖是板橋望族後裔林明成捐獻政府的祖產，爲什麼不立碑記敘其事，以資勵世。

這個建議，不是始於今日，很多人都認爲台灣煤業殷商李建興爲感恩蔣公光復台灣，捐獻陽明山土地闢為公園，都曾立碑紀念。自然，慈湖也是同樣的應該立碑，否則，歷史將留此空白。

其實，早在民國七十四年，陳資政立夫先生便曾爲此擬就碑文，但輾轉稽延，政府有關方面迄未實現。其所撰碑文，原文如下：

「台灣山川之奇，靈氣所鍾，莫若慈湖焉。其地爲板橋林府所有，林府台之望族，其先德林熊徵先生爲革命先進，早歲與前國民政府故主席林子超先生等在日參加同盟會，並致力振興實業，先後助建粵漢鐵路漢冶萍公司及漳廈鐵路，人咸欽之。黃花岡之役，林覺民先生等因得其助，措旅費、置槍械，乃參與廣州起義，其事世尠有知之者。台灣既光復，熊徵先生雖於民國三十五年作古，其夫人林智惠女士，仍能秉其遺志，撥私產一百三十七公頃，設學田，資助大學青年，迄今已逾二千人。民國四十四年，先總統 蔣公蒞止今之慈湖，覽山川之勝，以靈秀頗似故里

溪口，擬築屋作為滌塵之所。經台灣省府商租林府，林夫人慨然願以此十九公頃土地全部捐獻，然當時未為 蔣公所允。省府乃以免費訂租，十年為一期。 蔣公崩殂，舉世銜哀，治喪委員會以 蔣公愛慈湖山水，遂奉靈柩暫厝於此，以俟大陸重光，擇吉奉安。湖山何幸，從此長侍一代偉人，今日慈湖，是以成為中外追慕 蔣公者，千萬人禮敬勝地。民國七十三年，熊徵先生哲嗣明成先生，忠孝不讓乃父，以訂約將屆三十年，重申捐獻之誠。台灣省府呈報總統，察納其議，特頒獎表揚，各方皆佩明成先生之志行，宣傳之不朽，乃為之記。世之虔誠以謁陵者，其知茲由乎。」

立夫先生是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的董事長，也是明成的父執，平時以世伯尊稱之。立夫先生自民國三十七年林熊徵學田基金會成立後，即為董事長，迄今已四十餘年。他認為這是極有意義的工作。該會係林太夫人林智惠女士，秉承熊徵先生遺志所創設，供其使用土地，多達一百三十七公頃（民國五十四年，明成續捐山林一千多公頃），設置獎學金，迄今獎助大學青年高達二千六百三十人，過去如宋楚瑜、魏鏞、蕭萬長等人，均在其列。

明成是我的內表弟，其尊人熊徵先生棄養時，明成僅三歲，及長，入政治大學，後至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深造，得法學碩士，除經營永琦百貨外，熱心公益，資助文教事業不少。民國四十四年，台灣省府為洽租慈湖土地時，太夫人尚在堂，太夫人即願以所屬十九公頃土地全部捐獻，言辭極為懇切，然未為先總統 蔣公所允。省府只得以免費借用方式，訂約租用，十年為一期，民國七十四年，已屆三期。明成由海外歸來，

七十三年便呈報總統經國先生，重申捐獻之誠。當時經國先生即核示題頒匾額，以示嘉勉。是年，省府邱主席創煥在十二月省府動員月會中，頒發感謝狀。七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內政部吳部長伯雄，復轉發總統題頒的「尚義尊仁」匾額。同年六月廿四日，蔣總統經國先生並親自接見明成，語多嘉許。當時我爲此事亦曾致函省府邱主席，對明成忠孝篤行，希望立碑紀念一事，有所申述。邱主席即交省府建設廳黃廳長鏡峰轉慈湖管理處鄭處長敦浦少將洽辦。我陪明成於謁陵後曾走訪鄭處長，研商結果，認爲保全陵園整體規劃，立碑以慈湖西側約二百公尺公路旁附近爲宜。立夫先生爲促成其事，曾致函政府高層有關人士，告以明成訪晤鄭處長經過，並願出資立碑情形。不料輾轉稽延，以迄經國先生逝世，此事仍如石沈大海。

像這樣具有歷史價值的事蹟，明成忠孝爲懷，實爲可貴。其捐獻國家偌大的土地，無論用於何處，都有立碑紀念的必要，何況這是奉爲一代偉人 蔣公陵寢所用，豈能視爲一般史蹟。過去傳播媒體或因知之不詳，很少報導，如使任其湮沒無聞，不爲外界所知，確屬遺憾。世界各國對於史蹟保存，惟恐其不可得，惟恐其不真不詳，我們竟知而不爲，廢而不用。保存史蹟絕不受時間的限制，其價值將是永恆的，目前雖已時移事遷，如能速圖彌補，仍無礙其紀念價值。值此紀念 蔣公一百零六誕辰方過之日，筆者因對慈湖土地捐獻一事，自始至終，知之較詳，感慨之餘，願爲歷史請命，籲請政府有關方面，接受立夫先生的建議，立碑一事，早促其成。

(原載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國時報)

典型始信布衣尊

——為紀念三老逝世三周年而作

三連先生離開我們轉眼已經三年了，在此三年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都有太多的變化。如果今日他尚健在，不知他是憂是喜，也不知有些變數他是否具有影響的力量。感事懷人，令人倍增無限的追慕。

我們古代民間有布衣傲王侯之語，布衣當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言重九鼎的社會賢達人士，就是說社會賢達在民間的風評中較之王侯之輩要值得高傲得多了。所以，望重一時的布衣，顯然不是以顯貴權勢見稱，也不是佩虎符、坐臯比之流所能企及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擁有廣大的服膺羣衆，他的言行對羣衆來說，不但足以為人表率，而且對國家、對社會都有匹夫而為百世師的影響力。這裏，我們不容忽視的，這類衆望所歸的人物，他必具有過人的修養，包括高瞻遠矚的胸襟和眼光，守正持重的風格和作為，與恢宏謙沖的氣度和儀態。所以，處於動亂多難的時代，便能突顯他們在社會中地位的重要。環顧台灣，我所認識的已故耆宿林柏壽先生，與大德必壽的陳啓川先生，都是這類的典型人物。三老雖曾為行政官，但終其一生的行誼，也是這類的布衣人物。他們雖都不是執政黨的黨員，而他們能以在野之身，對國家對台灣的貢獻，無可諱言的是在一般黨員之上的。

我與三老訂交很早，遠在民國三十九年他當台北市市長以前，或因我們

都是出身於新聞界，彼此都有一種道義相敦、意氣相投的感覺。四十多年，我們的交誼，就是由此而建立、由此而滋長的。民國四十八年，自立晚報增資改組，三老為發行人，董事長為李玉階先生，我為社長，三老和李先生都是無黨無派人士，而我則為執政黨的黨員，我們之間，有時雖不免有不同的意見，但一切為報社，在無私心、無隔閡的情況下，彼此密切合作，成為我今日懷念三老最難忘、最可貴的一段時光。三老最令人敬佩的是，相互尊重，協調各人的意見，無不見其老成持重，大體而言，要在謀事則慎，見事則明，處事則公，心胸寬宏，一切都是從大處著眼。當時國家處境極為艱難，三老對國是所持的意見，無論處事言談，都能處危則慮深，顯示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無愧為公忠體國的典範。

像三老這樣典範，自然為人所重。所以，民國三十六年，首次舉行國大代表選舉時，他在台能以二十三萬票的紀錄當選，成為全國各地代表得票最高的佔盡風光的人。

昔年曾任台省主席的周至柔先生，也是十分讚佩三老的人。過去與我談起台省主政時的往事，談到議會，他認為三老是最值得敬佩的人，每次議會席上，質詢的問題，無不是理性而懇切，坦誠而落實，鞭辟入裏，都是很有建設性的、前瞻性的。而且當時的議會，沒有毫無意義的叫囂，與大作政治秀的鏡頭出現。民意代表，有此風範，當然一言九鼎，布衣所以貴乎傲王侯者亦即在此。

有人戲稱三老是以肚皮辦事，頗為傳神。肚皮者，就是有容乃大的度量。張岳公生前常愛談四川的彌勒佛，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便可以

作此解。這是修養很高的境界，望之仰不可及。如今都已前不見古人，
新生一代，不知能有幾人尚知如何的去見賢思齊，取以自我策勵。

(原載八十年十二月廿九日自立晚報)

天地能知許國心

——為紀念陳炘先生百齡冥誕而作

光復後我在台北已住了四十八年，也搬了三次家，至今保存著除富有紀念性的書籍圖片外，還有一件也是富有紀念性而且十分珍貴的物品，就是陳炘先生當年贈送給我的大甲台灣蓆。每次看到這條蓆子時，睹物思人，心裏便有無限蒼茫悵惘的懷念。

我第一次與陳先生見面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抵達台北後數日，一週後，他又招待我們記者團遊覽日月潭。當時因政府尚未正式接管，隨前進指揮所來台的黃朝琴、王民寧先生建議，由民間團體負責，促成此行，所有費用，都由陳先生所主持的公司負擔。記者團包括重慶中央日報楊政和、上海大公報費彝民、重慶大公報李純青、掃蕩報謝爽秋，我則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被邀。如今這四個人都已先後作古，而我也已年屆八秩，往事如煙，撫今追昔，倍增無窮的感慨。當時陳先生是請台灣信託公司信託部的經理謝國城先生一路陪同前往日月潭，飽覽台灣的風光。

我所接觸到的台灣高階層人物，後來還有林獻堂、林茂生、羅萬俔等先生，他們都是深受中西文化薰陶，風骨嶙峋的知識份子，而陳先生並不像林茂生先生這樣意氣風發，豪情萬丈，古文觀止可以口若懸河的背出，純然具有名士派的典型，陳先生却是比較內斂，有涵養，有深度，

也有強烈的正義感，一個剛毅不阿的人。他們相同之處，則在每人內心都洋溢著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對台灣光復，對歡迎祖國來台的政府人員，與很多台灣同胞一樣的都掀起了忠愛擁戴的高潮。後來我與陳先生及林茂生先生，也常有聚會，他雖不如林茂生先生的善飲，但他的正直持重的器度，沉默而饒有西洋學者的風味，使我留下了很清晰的可敬印象。

陳先生畢業於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理財科後，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深造，當時他是在美罕見的台灣留學生之一，回台後便成為金融界首屈一指的領袖人物。台灣光復前一年，他與林獻堂先生等友好合資設立的大東信託公司，及其他兩家信託公司，與台灣銀行合併成為台灣信託公司。光復後，被派為台灣信託公司籌備處主任委員，公司正式成立後，陳先生接任董事長。三十五年六月參加台灣致敬團到南京，回台後又集民資五千萬元籌設大公企業公司，被推為董事長。但政府方面卻認為他所領導的信託公司應屬日產，與其他機構同列為接管的對象。當時主管機關是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是嚴家淦先生。三十五年八月，陳先生以我常接觸政府領導階層，又與陳儀長官嚴處長相識，認為政府與民間的溝通，可以由此管道獲得下情上達。於是，便偕長官公署顧問李擇一先生前來看我，說明他所主持的公司，純屬民營機構，不應與其他日產同樣的列為接管對象。我認為政府重視民意，迭有昭示，義不容辭的便陪他們去拜望嚴處長，未獲許可。告以該處無裁決的權力，要我們去請示葛秘書長敬恩，我們只得進謁葛秘書長，誰知葛秘書長如出一轍的說必須請示陳長官。我們便「等因奉此」的去請示陳長官，陳長官毫不疑慮的說，此事須由主管機關依法查明處理。我們便像一個皮

球似的整個上午在長官公署的樓梯上被踢來踢去，踢不出一個結果，我們只得敗興而歸，此事政府對滿腔愛國熱忱的陳先生，自然感到大為失望。從此陳先生對政府的言論，由心灰意冷而逐漸趨於不滿，這是人情之常的反應，我們能寄以苛責嗎？

我們翻閱古今中外歷史，凡是一個有為的政府，或政績輝煌的時代，當局必能察納獻言，俯順民情。漢代之有文景之治、唐代之有貞觀之治，如無此何足以推崇於後代。台灣光復後，台灣同胞對政府，都擁有一顆強烈的嚮往之心，但後來未及二年，何以一變而為民怨沸騰，終於釀成了「二二八」事件。我們如檢討當時的情形，當局雖求治心切，但未能察納獻言，俯順民情，以致構成了無可彌補的隔閡鴻溝，這是事實，也是當局難辭其咎之處。我們讀到愛國詩人陸放翁「風雲未展康時略，天地能知許國心」的詩句，實為台灣光復後，若干未能酬其夙願的碩宿，對政府所持失望心情的寫照。

陳斡先生空有許國之心，當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後，三月十一日即失蹤，四十多年來不見下落，對台灣金融界而言，實為百身莫贖，難以補償的損失。歷史成敗，往往取決於片言一念之間，天地悠悠，悔將何及，徒留後代讀史者無窮的感嘆。今年適值陳先生百齡冥誕，哲嗣盤谷、盤東兩兄定於今日（十二）舉行追思禮拜，我在奉柬之餘，內心實為百感交集，追懷昔賢，已渺不可及，只望歷史能成為後事之師，能成為後代之鑒。

(原載八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自立晚報)

雜感篇

驚濤歷盡看台灣

——光復後來台四十七周年述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舉國正在為抗戰勝利而歡騰的時候，我以中央社台灣特派員身分，從陪都重慶偕政府首批來台接收的前進指揮所人員，搭乘專機橫空飛越半個中國，經上海而抵台，採訪台灣光復的新聞，屈指至今忽忽已經四十七周年了。

十月五日，應為台灣光復的實際時間，因為五日已有政府人員抵台，次日復在前總督官邸（即台北賓館）舉行升旗典禮，中國國旗從此飄揚在台灣的天空，十日的國慶紀念大會又在公會堂（即中山堂）舉行，而將光復節訂於十月二十五日，實因台灣地區受降典禮是在二十五日舉行。

十月五日與我同機同時抵台者，政府方面主要有葛敬恩、黃朝琴、李萬居、王民寧等人，新聞界有楊政和（中央日報）、謝爽秋（掃蕩報）、李純青、費彝民（大公報）四人，如今他們都已先後作古。

四十七年不算是很短，在這將近半世紀的歲月，充滿著動亂與變遷，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無論對國家或對個人，都是經歷很沉痛、很辛酸的歷程。現在一切雖已遙遙而去，但那些留在記憶中的情景，如一部波濤起伏無常的歷史電影，無不歷歷在目。四十七年來，世局的變化太多，台灣的變化也太多。以台北市來說，當時人口還不到三十萬，而

今卻已超過二百八十萬；當時全市小汽車還不到三十輛，而今卻已超過五十七萬輛。那個充滿日本情調，樹影婆娑的海島幽靜都市，而今風貌大異昔日，滿耳的煩囂，滿目的塵埃，滿街的車輛，行人摩肩接踵，一點也不幽靜。當時那些荒郊田野，如今也都分別的高樓聳立，寸土是金，成爲羣相角逐的場所。我雖久居台北，但三易其所，從庭院深廣的舊居，到大廈包圍的現址，也是歷經滄桑之變。那些連續不斷的記憶之夢，仍然不時的環繞著我。

回顧四十七年前，我們如走入歷史的隧道，細數當時人物，對台灣最有影響力的首推歷任主持省政的幾人，從行政長官陳儀，歷經省主席魏道明、陳誠、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周至柔、黃杰、陳大慶、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以至現任的連戰，我以側身新聞界的關係，與他們都有交往與認識，建立了或深或淺的情誼。他們各人雖都有不同的風格、作爲、與政績，但對建設台灣、愛護台灣的熱忱，並無二致。其中嚴靜波（家淦）、黃達雲（杰）兩位先生，至今因久病仍住院受診，每次我去探望他們時，看到衰老的臉龐，如爲歷史留下了見證，想到往昔都曾爲建設台灣而盡瘁，心中便有無限歲月催人的悵惘。

回想光復後的台灣，實爲時代的寵兒。當時湖北省主席王東原訪台時，曾與我談到省政建設，他說台灣一省的預算，可以抵得大陸五省，單以農林廳一單位的預算便可抵福建一省的預算，大陸各省戰禍頻仍，居無安日，怎能與台灣相比，言下不勝感慨。後來大陸變色，台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幸賴政府勵精圖治，積極有爲，終於建設這個以社會繁榮、民生樂利，足以傲視西太平洋的復興基地。而且自由民主的訊息，在亞

洲亦如海上的燈塔，大放異彩。

以政治而言，台灣光復之初，台灣同胞都從被迫害的日本統治桎梏之下走出，如撥雲見日，獲得自由。這種自由，自然十分的可貴。政府亦因深知大眾飽嘗亡國之痛，便儘量給予自由的生活。如日據時代被日人所拘的囚犯，不論罪之輕重，一律予以釋放，包括昔稱火燒島，現稱綠島的囚犯亦在其列。於是，政治層面形成了真空而全面解禁的景觀，但欲速則不達，自由畢竟不同於放任，須先以法治的守法觀念為其必有的基礎，不能有損別人的尊嚴與權益，也不能憑一己所好，發抒不負責的言論。所以，要使台灣同胞都能瞭解自由民主的真諦，便須先經過長期的政治教育的培養與涉練，不是以速食方式便可以消化而得之的。而其負面的影響，光復初期，便因誤解自由民主，為社會製造了不少治安上的困擾。現在回看四十七年以後我們的社會，從老一代到新生一代，是否都已廣受政治教育的洗禮？對自由民主的真諦，都已徹底瞭解？瞭解精神在那裏？規範又在那裏？解禁以後，自由民主的迴旋，給予社會各界的印象又是什麼？這是很值得我們檢討的嚴肅問題。譬如民主殿堂的打鬥風光，為各民主國家所少見，於是被人嘲笑列為世界十大新聞之一。令人不解的是，我們袞袞的民意代表，究竟對民主制度缺乏素養，還是因作秀心態的作祟，蒙蔽了一切。民主政治需要反對黨的制衡，這是絕無疑義的事，現在的反對黨，雖已漸成氣候，但必須保持反對黨應有的風格，為國為民而努力，贏得民衆的支持，豈能一味表現為反對而反對。

談政治的言論自由，我們如追溯四十多年的情形，與今日相較，真是不

成比例。聞名中外的《自由中國》雜誌停刊事件，如取當時的原文再來一讀，不禁撫卷長嘆，今日的言論，如退到四十多年前，又將如何處理？雷震（《自由中國》負責人）如尚健在，必然自嘆落伍。誠然，這是戒嚴與否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何足訝異。當時各報小心翼翼，如履春冰，如蹈虎尾，不容半點失誤。衆人皆知的以「中央」誤爲「中共」，便如滔天大禍，主管非自請處分不可。民國四十年初，我在主持中華日報時，某次竟將頭條新聞標題的「蔣總統」三字，誤刊爲「蔡總統」，真令人提心吊膽，幸而及早發現，不至釀成大禍。某次又將「大陳義胞抵基隆」的「抵」字，誤爲「押」字，手民惟恐禍將及己。凡此種種，可惜無人撰編成書，以傳後代，亦屬新聞史料的缺失。

再說省籍問題，光復之初，台灣同胞視外省人如親人、如嘉賓，相處極爲融洽。二二八事件以後，省籍兩字，始爲人所注視。後來因二二八的史料被塵封，視爲禁忌，於是省籍兩字，人多避談。其實，此爲政府與民衆缺乏溝通，處理不當的偶發事件，因被一些失意的政客之流造勢利用，遂有野火燎原之勢，爲歷史留下了難以彌補的傷痕。解嚴以後，有人復以此作為政治攫取的籌碼，於是提到省籍，便令人十分敏感。蔣經國先生生前常以台灣人自居，就是希望消弭此一不正確、不正常的觀念。所謂省籍，實則只有增加隔閡，只有破壞和諧團結，絕非台灣之福。行政院郝柏村院長最近在立法院，談到省籍問題，也認爲易於啓人以分化滲透的機會，危及羣體的安全，沈痛而有見識。

四十七年來，飽覽世局，歷盡滄桑，使我深感政府若干措施的失敗都出於人謀不臧。如能處理得當，歷年來真不知可以減去多少糾紛。二二八

事件，就是明顯一例，如能適當的溝通、疏導、便不至如後來之不可收拾。檢討政府方面當時失察，至少有下列四點可作為前車之鑒：

（一）政府來台接收的人員，很多以接收大員自居，言行中便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對滿腔熱忱以迎漢官威儀的台灣同胞，自然熱忱大減，轉為失望。

（二）政府高層次人員，無論操守、學養、能力，多數都足以信任。但低層次的基層人員，水準並不一致，表現互見瑕疵。我們如瞭解他們在各機構中所佔人數之多，便知與廣大民衆接觸最多的人，就是他們。許多基層班底，我懷疑他們不知什麼是政府的形象。

（三）政府處事很多缺乏主動性積極的作為，知於未萌，防於未然。一旦問題發生，只有被動的去應付，處理不慎，便會肇事生端。當初難塞民怨悠悠之口，就是缺乏洞燭機先的人士。

（四）政府主管雖不乏明智碩學之士，但處理公務往往考慮太多，躊躇不前，慎謀而不能斷。我們無意責以顛預，或官僚習氣太濃，只是行政效率深受影響，此為一般民衆所不能諒解的。

遙想光復初期，台灣同胞之可愛，一為真誠無偽，一為守法克己。因為真誠，所以歡迎政府來台的接收人員，掀起高潮，表達了愛的最高點。因為無偽，不擅包裝，如對政府不滿，不加細察，也會直覺的聽從別人的話。至於守法克己，克己是我們傳統的美德，守法多少還是受了日人高壓統治的影響，養成不肯多說的習慣，成為沒有聲音的一羣。

至於遭人非議的台獨問題，本質上，台灣與大陸是一體的，民族的資源

見於文化，而台灣與大陸的文化也是一脈相承的。台灣的文化不僅導源於大陸，根亦在大陸。大陸已被中共政權所統治，中國未被中共所統治的只有台澎金馬等地區，如果台灣不知自保，不知團結，不知自由民主的可貴，必將禍至無日。今日台灣，熱中政治者如喻之為舞台，這個舞台，無論誰在演唱，執政黨也好，在野黨也好，都須先保住這個舞台，這幕戲才唱得下去，如果舞台被毀，自然戲班也必然慘遭拆夥了。陳資政立夫先生曾告大陸來訪的記者，他認為中國統一惟有以中國文化的力量，旨哉斯言。我們如翻閱歷史，當知古今中外歷史的教訓，武力不可恃，最後還須仰賴文化的力量。台灣與中國文化既為血脈相連，不可斷，亦不能斷。聖經所謂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夠亂，豈容瘋狂之徒的存在，為我們自絕努力的路。

再說引為自豪的經濟，目前台灣外匯存底已達九百多億美金之鉅，為全球之冠。英前首相余契爾夫人月前訪台時，盛讚我們的經濟奇蹟後，認為奇蹟不可能永遠的保存，保持奇蹟，必須繼續不斷的努力擴展，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回想光復之初，政府經濟政策並未成功，因為戰後民生凋敝，物質匱乏，政府未能為民衆有力的解決實際困難。中央政府遷台後，處境岌岌，幸而領導階層深謀遠慮，集中各方的智慧與力量，終於排除萬難，突破逆境，為中國歷史創下了經濟出現奇蹟新的一頁。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聲名，從此遠播海內外。彼岸大陸，望塵莫及，有人便提出「經濟學台灣」的口號。像這樣因經濟起飛的蛻變，國家機運亦為之轉變。然而，我們亦不容否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人性的弱點，無不由此而暴露無餘，尤令人憂心的是功利主義的乖張與誤導，流弊所至，只知重視現實，只知愛慕虛榮，急功好利，造成社會大眾對價值觀念的

偏差，昔日我們可以傳統的道德規範，作為行為準則，而今則早已失去約束的力量。整個社會如被物質所充斥，導致風氣日趨奢靡，大眾對生活享受的標準與要求，從都市到鄉村，都在不斷的提高，相競成習，成為經濟掛帥下畸形的發展。農業時代，我們習聞飢寒起盜心之語，如今竊盜案無日無之，盜心決非為飢寒，飢寒也不見於今日台灣社會。他們所追求的無非金錢揮霍，物質享受而已。我們一向崇尚勤儉，奉為傳統美德，如今這種精神，也早已為社會風氣所否定，連同道德觀念成為遠離現實的空谷傳音了。所以，我們雖為經濟繁榮而喜，亦為其負面的影響而憂。

再者，台灣的建設，我們不可抹煞另一種力量的貢獻，就是教育。台灣教育普及，義務教育的就學率，佔百分之九九點六九，這是大陸各省瞠乎其後，難以相提並論。因為教育普及，人人都能說國語，人人都有閱讀能力，國民知識水準，自然隨而提升。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後，農民生活又徹底的改善，農村兒女榮獲碩士、博士等學位，已屬常見。過去大陸時代，如福建省莆田一縣能有幾十名留學士、兩位大學校長（一為上海大夏大學歐元懷、一為福建協和大學林景潤），便認為教育水準為全國各縣之冠、引為自豪。此在台灣，並不稀罕。各縣市每年都有留學士榮歸故里，單是鹿港一個鄉鎮，人口不過數萬人，博士便有數十人之多。台灣如果無此濟濟人才，從十大建設到目前的六年國建，便無法廣攬龐大的學以致用的專才，我們亦難以邁向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但是，也有人稱台灣為貪婪之島，這是病態，其一病在我們的社會大眾太自私、太短見，目光如同麻雀，所見都是汲汲於眼前的利益，很少真

正的具有立足台灣，放眼天下的胸襟。那些實事求是，富有奉獻精神的人，因為他們聲音太小，或沒有聲音，反而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其二病在社會風氣敗壞，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若干年前有鑒於此，便要求我們共同來建設書香的社會，希望大眾除了追求金錢之外，也需要追求文化。談書香，我們自愧不如日本，日人很愛讀書，到處都可看到他們默默的捧著書。而我們則對聲色之娛，一揮千金，毫無吝色，卻不願意去買書，平時也不注意進修，很多人離開學校後，便不去接觸書本。改進這種現象，如化濁流為清流，清理源頭，絕非一朝一夕之力，便能奏功。

綜觀全局，四十七年來，台灣雖在國際風雲詭譎，驚濤駭浪中得以屹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都在開創未有之局，誠屬非易。目前政府復在中共對我外交施以孤立的壓力時，推展務實外交，能以實際力量，爭取實際效果，不尚虛言，尤為可貴。然而，當此社會轉型，憂患未已之際，我們努力的途徑，無疑的只有團結，只有摒除歧見，不料從政府到民間，從團體到個人，我們卻不難發現不少與此背道而馳，其中挾以本位主義、派別意見、私人權益、過去恩怨等因素，亦有缺乏倫理觀念，罔顧道義，鉤心鬥角，必以得之而後快，甚至無視國家利益，與民衆福祉，能不令人怒焉憂之。

此外，新聞事業因我忝為老兵，關心尤切。從光復後的獨家新生報，以迄目前的各報爭奇鬥豔，互見千秋，四十七年的歷程，林林總總，心中藏之，無日忘之。今日盛況，個人的感受，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民主社會，新聞自由，終於獲得實現，各報言論報導已廣受重視。憂的則是記者們雖展出渾身解數，但並未如想像中提升報紙的水準與品

質。目前言論有時竭諷刺挑剔之能事，其放任較之當年二二八前部分報紙為尤甚，只以時代開放，允許妄用自由，無人為之約束耳，然亦究非報業發展應有的健康常態。記者面對此一趨勢，如何堅持原則，堅守立場，以公正之筆，為社會存正義，不改其應有的風格，只有等待考驗與檢討。我們認為理想的記者，雖處萬變而不變其風格。

最後談到大陸問題，談統一，我們雖有國統綱領可資遵循，但這條路是極漫長的，極坎坷的，需要有超人的遠見與耐心，具備大智慧、大氣魄、大擔當的政治家負此大任。決非如過去兩年來台灣若干人士，走幾趟北平釣魚台賓館，與中共顯要握握手，或大陸那些貴賓來台北市暢遊龍山寺，彼此談談台灣掌故，便可找到我們所企求的答案。只望有朝一日，負此大任的人物，廓然出現於廟堂之上，掌握新形勢，開拓新境界，能以非常人的才智，完成非常人的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奠定了民意所歸的千秋大業。但此絕不可設限於小圈子、小角落，自我陶醉於方寸之地，忘其源本。否則，等於慢性自殺。這是生於斯，成於斯的人，都不容昧於當前的情勢。

遙望大陸山河，來台後雖曾數至大江南北，只因隔絕已逾四十年之久。想想大陸的風光、民情、鄉土，只有增人無限的懷念。如再回去看看，或可領略中共統治下，那塊古老的土地，究竟改變到怎樣，留下了什麼。當年作家郁達夫在《感傷的行旅》一文中曾感嘆說：「江南的景色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可哀」，只恐屆時也有同樣的感傷。

四十七年的歲月，在我望八之年的生命歷程中，只過一半，另一半卻在那遙遠的大陸，那個金色年代，不少的悲歡哀樂都留在那裏。如今面對

著這個動亂的世界，彷彿永遠難得寧靜，還不如讓我們回到這個驚濤歷盡，情如故土的台灣，與台灣憂樂相共。

(原載八十一年十月五日中國時報)

思前賢，看今朝

光復後，我在民國三十四年清秋的傍晚踏入台北，便與寶島結了不解緣。近半世紀來，國家多難，世局多變，我以廁身新聞界，涉歷既廣，閱人亦多。近來或因進入老境，常像蘇東坡所說的「感時懷舊一悲涼」，撫事懷人，百感交集。前輩人物，最爲我難以忘懷的，就是已經作古的兩位黨國耆宿，一位是前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一位是中央通訊社的創始者，也是首任社長蕭同茲先生。他們所秉持的清操、風範、氣度，一言一行，都足以爲後代的典範，發人深省。

張岳公爲中國政壇享壽最高的一人，今日台灣各界提到岳公，那種恢宏、坦蕩、雍容、謙和的風範，立即浮現在衆人的面前。岳公的一生，爲國家出力最多的就是對日本外交，晚年曾以所經歷的中日外交七十年，撰寫了一本專書，爲歷史作見證。我們如追溯當時中國所處那種被脅迫的情勢，忍辱負重，自然是不爲外界所盡知的。中日未斷交前，岳公會以特使身分訪日，返台的前夕，旅日華僑曾集體為岳公餞行，濟濟一堂，約有數十桌。不料岳公鄰桌的某君，聞係我方駐日大使館高級人員，卻不顧一切，大放厥詞，指責岳公負責對日外交七十年，有負國人期望，愧對國人。此君借酒發洩，罵聲愈來愈高，同桌者隱忍而告岳公。但岳公始終處之泰然，不發一語。後來且與同桌講了一個典故。他說成都有彌勒佛寺，上懸「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一聯。聽者無不欽佩岳公的修養，一時傳爲佳話。「能

容」、「常笑」，言之易，行之則難，除自身潛在的智慧外，還須看平時讀書內在的功力如何，腹內墨水的容量又如何。能容，即能忍，自古以來，便為學者所重視。蘇東坡作留侯論，認為張良之成功，就是得之於能忍。過去鄭資政為元任國防部長時，便引用蘇東坡所說：「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之語，在立法院大堂中擲地有聲的答覆了立委們的質詢。如小不忍則亂大謀，自然不是理想的政治家應有的氣度了。所以，多讀中國書，便可領悟忍的道理。曾國藩認為讀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所見亦在此。書中不僅蘊藏著中國文化，也蘊藏著中國精神。

再說蕭同茲先生，他的一生事業在中央社，聲譽也在中央社，中央社鼎盛時代，揚名國際，足以與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等並駕齊驅，都是歸功於他的領導。所以，新聞界的老一輩至今仍奉他為泰山北斗。他的風度，過去周至柔先生曾讚稱：三爺（同茲先生）的風度別人是無法學到的。我因追隨甚久、相知亦特深，這裡就其日常生活中的小節，略述數事：

第一，三爺從不求名，他在社長任內，雖貴為中國國民黨中常委，但不希望中央社編輯部於每週常會後所發的新聞有他的名字，認為中央社是公器，不可私用。過去很多顯貴，都喜歡報上有他的名字出現，我在主持中央社台北分社時，中央大員居正先生蒞台，某公便因隔日新聞報導歡迎行列中沒有他的名字，前來興師問罪，以視三爺，何啻霄壤。

第二，三爺之於中央社，情如父子，香港分社主任曾恩波生前稱三爺為「中央社先生」，其所代表精神，旁人未與焉。一旦割捨，情所不堪。

於是，親友們乃相約定期前往蕭府共餐或出外小酌，欲以相慰。而三爺從不介懷，離職後，據家人告，從無怨言，亦不提中央社，自然更談不到今日所謂情緒的「反彈」。

第三，三爺不屑世態炎涼，當周至柔先生任台省主席時，曾應美國務院之邀，前往訪問。當時松山機場送行者人山人海，都搶先與至公握手。三爺則獨處機場一隅，靜觀熱鬧人潮，無意去擠。他表示心到即「誠」也。後來黃達雲先生受命接任台省主席，台北各界人士爭相前往中興新村參加移交典禮，道賀者極衆。而以三爺與達公關係之深並未前往，卻邀台省耆宿林四爺（柏壽先生）與我同日上午到松山機場迎接甫自省府卸任的周至柔先生，至公頗受感動。

第四，三爺經常捨己爲人，曾國藩贈胡林翼有「捨己爲人、大賢之量」之語，三爺確有大賢之量。見其小者，如某次方城之戲，他已和牌，但發現下家某夫人，也是和牌樂不可支。三爺便急忙將牌推倒，背後看牌的已故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先生，不解其故。後來始知三爺以某夫人是輸家，不如相讓。雖是小事，旁人不能爲，而三爺能之。這是最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

我們回到現實動亂的世界，環顧衰衰諸公，坐賓士車，招搖過市者有之，大鬧民主殿堂、張牙舞爪者有之，趨炎附勢，如群蠅相逐者有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能如岳公與三爺這樣大度大量、持之如一，不爲環境所動搖、所改變，處之泰然者不多見。

台灣的政局，自從各報競載內閣總辭及繼任人選等報導後，整個天地爲驟風急雨所籠罩，捕風捉影，論壇也被無端的激起了驚濤駭浪。如以舞

台劇比喻，我們身為觀眾，看到這齣歷史劇演到最高潮時，真是緊扣心弦，發於良知的憂國憂時熱忱，如漩渦激盪。現在，歷史劇已經落幕，觀眾對劇情的發展，從廟堂到里巷，無不引為談資。這是民主時代，也是民意爆發時代，自然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是，從此又引出了另一個眾所矚目，見仁見智的問題，就是對理想政治家的素養，議論紛紛。

我認為真正理想的政治家，至少須具備下列各點：一、有眼光用人，二、理想的智囊團，三、高明的政治藝術。能用人，司馬光在一千年前便曾說過：「為政之道莫先於用人」，歷史上，多少開國具有恢宏的氣象，多少盛世具有輝煌的政績，無不因有一群能臣為帝王所用，然後成其不世之業。劉邦之用韓信拜將，韓信則稱劉邦為能將。能將，就是能領導群倫，知道如何去用人。蕭何、張良、陳平等曠世之才，乃能竭智盡忠，發揮到淋漓盡致。劉邦毫無政治資源可言，後來剷除開國功臣，也為人不滿，但他的用人智慧，卻不能不令人激賞。唐之開國，亦因李世民之能用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一群能臣，始能開拓威鎮八方的鼎盛時代。其餘如文景之治、開元之治等盛世，無不有賴於重用人才。所以，先總統 蔣公亦曾昭示：「中興以人才為本。」至於智囊團，任何領袖或政治家，都有智囊團為之策劃，智囊團的成員，不僅要有飽學之士，還須看有無政治人格、政治道德與政治眼光。諸葛亮勸劉禪要親君子、遠小人。這是惟恐昧於明察，為小人誤國。已故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因智囊團為共黨份子所滲透，終於墜入紅色陷阱，難以自拔，此為一例。智囊團如缺乏眼光，或患短見、或圖一時之利，出些餽主意，欲益反損，便像工程犯了設計的錯誤，貽害無窮。歷史上很多事例，都是誤於在旁獻計的智囊團。前事可師，一個以領袖自許的政治家，不可不

察。所以，智囊團如不理想，小者爲個人誤、大者爲國家誤。再說政治藝術，最近郝柏村院長接受記者訪問時，自認政治藝術差了一點。何謂政治藝術？這是有異於權謀，權謀是政客之輩，翻雲覆雨，使詐而爲之，應爲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鄙視、所不取。政治藝術，應是心中有誠，而能以調和爲目的。張岳公所說的能容、常笑，非高度智慧莫能爲，運用得當，與佛曰不可說，都是屬於政治藝術的表現。西漢的東方朔，應爲此中高手，他能以最機巧、最精簡的言語，一語化解僵局，或排解難題，貴乎詼諧中寓有諷意，但仍不失其真誠。歐美不少政治家，如羅斯福、邱吉爾都能憑其機智，幽默一番，以言語代替人力解決問題，自然亦屬政治藝術。這種境界，真如諸葛亮的羽扇綸巾，指揮若定，成敗都可取決於談笑指顧之間。

當前政局擾攘，社會各界雖有各種不同的反應與批評，但期以化戾氣爲祥和，精誠團結，努力建設，國家前途從此呈現光明的遠景，則無二致。名作家魯迅當年有詩云：「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移用於今日，真可爲在此兩千萬人心情的寫照，這是大衆共同的心聲與期許。

(原載八十二年二月廿二日中國時報)

卓越、遠見、天下

久居空氣污染的台北市，所見者滿目塵埃，所聞者滿耳噪音，空間如被煙霧所蔽，視野狹窄。最近因有日本之行，登機而上，環顧雲霞萬千，鳥瞰波濤洶湧，回首台灣，漸行漸遠。使人頓覺宇宙無窮，胸懷曠達，俯仰於天地之間，塵襟滌盡，想到蘇東坡所說的「渺滄海於一粟」，此身實在是太渺小了。旅篋所攜平日常看的《卓越》、《遠見》、《天下》三種月刊，其中不乏憂國匡時的論著，原擬藉旅途之暇，詳為細讀。不期三種名稱，如影交錯，在我的思維中很巧合的正勾勒了台灣光復後四十多年發展所突顯的一些問題。閉目凝神，一時或步入遙遠的歷史隧道，或面對風雲多變的現實世界。這份遐思，如遊離於長空，如環繞於左右，又如發於良知的塊壘，揮之不去。回台以後，風雨不寐，特為之補記。

以「卓越」而言，過去先總統 蔣公常引用曾文正所說的「中興以人才為本」之語，這是萬古不易、放之四海皆準的名言，中外古今，莫不皆然。尤其是挽狂瀾於既倒之際，存亡成敗，都是取決於有無卓越的人才。在台灣，當年處於風雨飄搖，幾已危在旦夕的形勢，後來撥雲見日，化險為夷，終於成為亞洲自由的燈塔。雖然出於政府當局堅定信心，取以強勢的領導，其中最不容忽視的就是有兩大支柱的力量在擎持著，一為經濟力量，一為教育力量。領導人物，或高瞻遠矚，或精心擘劃，有的已為人知，有的則不為人知，他們的卓越貢獻，都是功在國

家。台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政府雖圖治心切，但若干措施，或迫於情勢，或出於人謀，事與願違。台灣行政長官改組後，陳長官公洽於離台前夕（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特邀我作了兩小時多的長談，提到當時政府各機關主管時，我以他主政閩台兩省先後十年的幹部以何人最為卓越相詢，當時在我心目中以為必屬嚴靜波（家淦）先生，他却坦然指為包可永。我復以嚴處長靜波（時為財政處處長）如何相詢。他說，嚴確為一位最理想的幕僚長。按包為陳公洽主閩時的建設廳廳長，出身於交通大學，留美回國後，曾在母校任教一段時期。他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則為工礦處處長，負責接管日人所留下的各種生產機構。當時台灣被盟機轟炸以後，很多生產機構都是滿目瘡痍。光復後，原毀的加以修補，很快的便能恢復生產。一面調整機構，積極的著手物資儲備等工作。無疑的，都是台灣的資源，與推動經濟發展無不有關。後來台灣經濟的取向，就是循此路線，邁向開發，日益昇華。所以，包可永實已制其機先的為台灣奠下了鞏固基石。只是為人所忽略，不為人所周知。政府遷台後，對台灣經濟最有卓越貢獻的人，自然首推至今猶令人懷念的尹仲容，尹氏亦出身於交通大學。李資政國鼎稱他為「出身電機工程，成就却在實業與經濟，不但精研理論，更長於實務，懂得配合動態之環境，尋求切實有效的解決途徑，勇於接受新的觀念與知識。」可謂知人之言。尹氏歷任財經首長，從台省生產委會、中信局、經濟部、外貿會、美援會到台灣銀行，都是在國家最艱危之際，負有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重任。平時雖傲骨嶙峋，但敢作敢為，勇於任事，無視外界的褒貶，一心一意，真正的為國家做事，謀國之忠，實所罕見。所以，有人稱他為「台灣經濟發展之父」，洵非虛語。我們今日經濟建設有此舉

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當知飲水思源，其來有自。

至於教育建設，雖為台灣建設中很重要的一環，教育普及，有助各種建設，但是我所懷念的却是開風氣之先的傅斯年。傅氏出長台灣大學後，雖為台大提高了學術地位，聲名遠播，最重要的還是為台灣帶來了富有朝氣與活力的學術自由風氣。傅氏當年希冀將北大的學術自由風氣，也能轉移到台大，重見於光復後的台灣。用心之專，所見之遠，不得不令人敬佩。當時台灣的確為之氣象一新，莘莘學子也都能廣受其澤。而他的誨人不倦精神，一以貫之的為國家教育而奉獻，始終不懈。不料不屈於民意代表羞辱之詞，竟以身殉。對教育界、學術界而言，都是百身莫贖，無可補償的損失。當時台大全體學生的輓聯為：「嫉惡如仇，以歷史為經，以民主為緯，正義永彰，繼起斯文望我輩。愛才如命，為學術而生，為教育而死，典型猶在，共揮熱淚哭宗師」。不知出於誰的手筆，傅氏的一生，的確是很沉痛、很傳神的描述而出。但在四十多年後的今日，我們的社會已在大幅度的改變中，台大畢業的青年們，人才濟濟，雖不乏國家棟樑之才，但回想當年以「繼起斯文望我輩」自許，環顧當前，究有幾人仍有如此使命感，毋負傅氏在天之靈。

蘇東坡評贊韓愈曾有「匹夫而為百世師」之語，匹夫就是平民，平民雖在古代，還是受到重視。現在貴為民主社會，像這樣進步的社會能有幾人足稱百世師，舉世滔滔，只恐惟有傅氏當之而無愧。如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緬懷傅氏，能不倍增仰慕之忱。

再談「遠見」，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都是具有遠見，高瞻遠矚，見人之所未見。先總統 蔣公當年安內攘外的主張，就是遠見，如非局勢乍

變，未安內便先攘外，中國或不至遭此後來歷史所罕見的浩劫。勝利後，蔣公寬大為懷，昭告國人對日本必須以德報怨，此亦所見者遠，所慮者深，深望中日兩國和平相處，維護亞洲永久的和平。這種遠見，必將為治史者所肯定。在台灣，當初大陸撤退，人心未安，陳辭公（誠）受命於危難之際，主持台灣省政，為國家留此復興基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其施政最高的原則，厲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促成農產與農民收益增加，佃農生活改善，導致農村社會安定，以農業支持工業發展，為後來的台灣締造了經濟繁榮的局面，當時亦憑陳辭公持有遠見以成之。雖然，此皆出於國父遺教，然如非陳辭公的大胸襟、大擔當，能從遠處著眼，運用其鐵腕，為人所不能為而能為之。所以，陳辭公為國盡瘁，出殯之日，台灣農民們無不以感其德，蒙其澤，路祭巷哭之哀，有人喻為農民們對陳辭公的情感，無異蜀人之於諸葛亮，其所受之擁戴，當時的台灣，實為前所未見。

台灣的地主們，如板橋望族耆宿林柏壽、鹿港辜振甫，為配合政府土地政策，便首先響應，慨然將祖先留下的大批良田，全部付與耕者，亦非有遠見所不能。環顧當前的社會，到處充滿著功利主義的色彩，汲汲以圖者，非功利而莫為，能不令人感慨無窮。

至於談「天下」，李登輝總統對友邦人士曾稱：治國的理念是天下為公，這是國父當年所昭示的理想最高境界，這種崇高理想，中外傾慕。我們恭聽之餘，當知體仰總統所持的宏願。中國雖在專制時代時，孟子亦有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語，即在北平故宮養心殿，至今仍可看到「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的對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愛國之士，無不以此爲披心瀝膽所期許的心聲。何況今日的民主時代，國人都知天下乃大衆之天下，天下事大衆便須傾身而為之。秉此理念，我們都應爲追求這個理想而努力。回想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陪都重慶成立時，門口懸有「欲做官者莫入此門」的聯語，以天下爲己任，勗勉青年，而青年亦能知所自勵，奮發有爲，置個人利益於不顧。那種國家至上的氣勢，精神所聚，所向披靡，與今日社會所見者，相去實遠。今日所見者，立足台灣，所想的不外是個人的利慾薰心，所見的不外是台灣一隅的繁榮社會。真能胸懷天下，爲國家捨己而奉獻的人，能有幾人。從小處來看，環保問題，便可以小喻大，考驗個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爲，能否爲社會公益著想，能否具有己飢己溺的意識。此次赴日，我曾深入鄉間，看到日人對環保問題的重視，政府有計畫，人民有守法精神，大家有公德心，令人爲之汗顏不已。爲什麼別人能，我們則不能。我們曾自認爲是很有智慧的民族，但也不否認是缺乏公德心，很不守法的民族。二十一世紀，都稱爲中國人的世紀，我們放眼台北，街頭的車群人群，爭先恐後，毫無秩序可言，民主殿堂的拍案驚奇，扭成一團，仍爲傳播媒體引爲世界奇觀。我們真沒有資格談以天下爲己任，只知自往臉上貼金，其欲不令人抱杞人之憂，豈可得乎？

我的故鄉福建簡稱爲「閩」，這個閩字，過去有人戲稱，福建人秉性好內鬥，很像門裏裝著蟲，關起門來，自相殘殺，但仍跳不出那門框。台灣現在二千萬人，其祖先多半自福建渡海而來此。如今高唱立足台灣，放眼天下，能否摒除祖先的遺傳，不存偏見，自強團結，一致對外，我們惟有拭目以待之。

個人來台忽將五十年，身歷世變，有看不盡的變在演變著。但堅信我們在此的人愛這個國家並沒有變。我們只望江山代有人才出，國家有更多的卓越人才，更多有遠見的政治家，為國家導向光明之路。普天下的子民都能為愛國家竭忠而奉獻。

(原載八十二年五月六日中國時報)

遐思

從中山樓到國會議會殿堂，從廟堂之上到里巷之間，袞袞諸公，泛泛小民，喧嚷終日，透過各種傳播媒體的報導，我們聽到的聲音，看到的文字，彷彿都是怎樣的選總統，怎樣的糾葛議事之類的新聞。其實，我們總統的任期尚未屆滿，修憲的目的也不是完全為著選總統。我們國家的前途、大局的前途怎樣，卻很少人去關懷、去注意，似乎早已消失於一片混亂中，連微弱的呼聲也難覓。

台灣確因經濟的發展，社會日益繁榮，民主的潮流，言論日益自由。這就是時代進步的動脈嗎？誰都無法抗拒，也無法逆料這裏所發生的事物。繁華是有負面的，自由也有負面的，而我們卻如在凸顯兩者負面的氣壓下生活著。四十年前，我們還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口號，十年雖在風雨飄搖中過去了，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努力方向，隱約地仍然存在著。而今我們的生活空間，好像沒有方向，我們的感受，只有奢侈、只有暴戾、只有虛浮、只有渙散，缺乏勤勞，缺乏祥和，缺乏誠篤、缺乏團結。我們的國家前途、大局前途，仍然一片蒼茫，無人去關懷、去注意，何者為輕，何者為重，也失去了應有的權衡和取向。社會任何的角落，似乎都在功利主義掛帥的旗幟下指使著、擺佈著。

因而很多亂象也從而產生，令人感慨的是，很多足以妨害國家發展和建設的事端也都無形的在此潛伏著、衍生著。政府為遷就民意，許多事件，舉棋不定，或朝令夕改，非惟不能取信於民，公權力、公信力也打

了折扣。有人或認為這是步入民主時代無可避免的現象，殊不知這是似是而非、本末倒置，徒令天下滔滔、所為者、所爭者，都是為逞一己之私慾，置國家前途、大局前途於不顧。屈原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們豈能重見於今日。雖然，時代潮流所趨，民意民怨都不可忽視，須知古人所說的「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一切能相忍為國，才是我們共同所期待的境界。也許這是我的遐思，但願能於我們這個喧嚷終日的社會見之。

(原載八十一年三月卅一日自立晚報)

談大老與大器

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我們對於這個大字，在意識上都認為這是崇高的、宏偉的、有容量的、有擔當的，絕不是常人所易與的。在這些大的字彙中，最近使我聯想到大老與大器。大老兩字，原出於孟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之句，所指的是伯夷、太公二人，此二老是何等偉大的人物，翻閱中國歷史，能有幾人足以相提並論。後代雖時移事遷，價值觀念也不一致，但能以大老相稱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決不是車載斗量。大老之令人敬佩之處，就是總統府故秘書長張岳公生前常說的「養望」，都已經臻於最高的境界，言養則大節凜然，具有松柏不凋於歲寒的情操，所見者、所為者無不是從大處著想。言望則眾人望之如泰山北斗，不以高名為己榮，雖歷經風雲之變，仍然老成持重，不以落寞而寡歡，遠世俗而能益見其高。其對國家、對社會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漢初蕭何，無愧國之大老，當時力排眾議，為國舉才，就是能從大處著想，但是終其一生，淡然自處。唐初魏徵，風骨嶙峋，言以興邦，亦屬國之大老。漢唐之所以盛，國有大老，實為不容忽視的主因之一。洎乎近代，最令人敬佩的如北京大學故校長蔡元培、南開大學故創辦人張伯苓之於教育界，開風氣之先，為國家造就不少人才。當時雖處江湖之遠，仍見其時有憂時憂國之心，尊之大老，自可當之而無愧。所以，大老絕非泛泛之輩，就像左傳所指的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至於大器，當然是指足以負大任、濟大難的國家卓越之才。稱為大老，

自然都具有大器的胸襟與才識，但是有大器者，未必都配得上稱為大老。環顧天下懷抱大器者多矣，我們雖不以將來都能成為大老期許，而目前如不知自惜其才，用得其所，只知孳孳為個人的名利角逐，而不知為國家、為社會多做些有益的事，未免令人扼腕嘆息。如今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時代，天生我才必有用，如有大器而不得大用，或淪為私利，或淪為作秀，非惟對人力資源是一種浪費，對社會也會構成負面的影響。想到古人所說的「國以賢興」之語，言念及此，能不感慨係之。

(原載八十一年七月廿九日自立晚報)

容量與民主

我們中國人品評各人的品德修養，器度是十分被重視的褒貶重點，能成大事業者，必有大器度，能有大學問者，必有大器度。反之，斗筲之器，或不能忍一朝之忿者，都成不了什麼氣候。器度，所顯示的是行爲的容量。所以，謝前副總統東閔，便曾引用古人所說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取以勗勉國人。希望大家都能有很大的容量，共體時艱，不計眼前得失，能從大處來著想。否則，大家都容不得人，長此以往，絕非國家之福。

放眼世界各國，談容量，見於大者以美國大選為例，選前所表現的都是劍拔弩張，各不相讓，而且竭詆毀之能事，那裏談得上什麼器度，但一旦勝負揭曉，那種昇華為民主精神的容量，失敗者，從未聞以失敗爲羞恥，恢宏磊落的胸襟，反而坦然向對方伸出道賀之手，不嫉視，不虛偽，民主精神之可貴，實在於此。而其小者，如日本人過去篤信武士道，事事必以佔爲己有而後快，處處必以勝利者自居。那種短小的器度、容量，醜態畢露。瘋狂的戰爭，終於注定失敗。又如美國南方那些越界潛入的墨西哥人，與無知的黑人，看到別人的高級寓所或名車，入夜便以油漆塗之，以洩其佔有慾失落的憤慨。如此劣跡，還談什麼器度、容量。

回顧我們中華民族素以泱泱大國自稱。今日台灣，外人都盛讚我們自由民主社會的進步，爲亞洲各國所未見，國人聞之，似乎其樂陶陶，忘卻

此身究在何處。揆諸實情，談容量，談民主，我們能否足以與外人媲美，言之可愧。我們這個社會，實在太開放、太自由。記得胡適之先生生前曾說過：「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因為自由不是放任，不能侵佔、損害他人的權益，一個民主社會的國民，更應懂得自由的真諦，自知如何約束，如何容忍。但我們眼前這裏所見的只有以民主之名，譁眾取寵，街頭亂嚷，惡形惡狀，不一而足。現在立委選舉在即，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但願我們的參選人士，都有大器度、大容量，以國家形象為重，摩拳擦掌之餘，都能三思而行之。

(原載八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自立晚報)

思往事 論千秋

我到台灣，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以中央社特派員身分，偕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陪都重慶一起搭機抵達台北的，也是來台記者羣中最早的一人。當時的感受，與置身日本無異，因為從滿街的路名、店名到木屐聲，看的、聽的，都充滿了日本風味。但是，入鄉問俗則不然，從衣冠到禮儀祭典、民情風俗，無不是保持了與隔海相似的中華文化的特質。最令人難忘的是，當我在政府尚未接收以前去參觀小學時，那裏的教師們還是日本人，他們仍舊口稱中國為「支那」，當場便有學生起立駁斥：「我們是中國人，不是什麼支那人」，理直氣壯，至今如聞其聲。當時給予我的啓示，日本軍閥雖在銳意經營，統治了台灣五十年之久，它所攫取的只是台灣的物質，所改變的只是台灣的外貌。中華文化的「根」，仍在這裏民間孳生著，中華民族的血，仍在這裏同胞身上沸騰著。

如今，事隔已四十餘年，放眼再看台灣，正面的建設，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已為舉世刮目，外匯存底且已直追名列第一的日本，貿易總額至去年亦高達一千一百多億美元，儼然睥睨一切。但是負面卻有不容否認的隱憂，我們的文化建設如何？精神建設又如何？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觀念的淪喪，滿街爭先恐後的混亂秩序，每天殺人搶劫的悲慘新聞，到處瀰漫著暴戾之氣，為台灣構成了一幅極為醜陋的畫面。所以，外在的繁榮風光，雖足以揚眉吐氣，為台灣炫耀於一時，內在的欠缺與不

足，我們卻不能不加重視，在歷史上為這一代留下了空白的一頁。我們歷經憂患，飽覽滄桑之餘，對國家、對世局，心裏所祈求的將不是一時的，而是可向千秋交代的。

(原載七十八年八月九日自立晚報)

吾國與吾黨

——寫在十四全大會開幕前夕

李總統登輝先生不久前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詞嚴義正的對黨幹部說，國民黨就是中國國民黨，無所謂台灣國民黨，對於澄清流言，具有啓示與矯正的作用。台灣國民黨這個名詞。對中國國民黨而言，黨的精神，不僅被漠視，也可說是類似中傷之詞。中國國民黨是建黨在海外，國父當初便有「華僑爲革命之母」一語，正說明國民黨成立時，力量是寄託在華僑的身上，激於中華民族正氣，凝聚華僑的力量以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則在救中國，推翻帝制。愛國者與有志攬轡澄清之士，乃能八方響應，聞風而起，滙成沛然而莫之能禦的力量，爲國家拋頭顱，洒熱血，義無返顧。國民黨的精神，貴乎在此。所以，國民黨黨員，從莽莽神州遍及全球各地，絕不是局限於某一地區。目前國土雖處於分裂狀態，但台灣有黨員，大陸有黨員，海外有黨員，自由地區有黨員，共黨專政地區也有黨員。每一地區都有黨員爲黨而奉獻，何來台灣國民黨之稱哉？

台灣光復將近五十年，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政府遷台，大局雖處於逆境，但國民黨基於不能放棄對國家所負的責任，痛定思痛，積極的改造革新，堅此百忍以圖成。今日台灣之有為舉世矚目，經濟繁榮，社會富庶的局面，我們得之不易，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

勵精圖治。將近百年的中國國民黨歷史，在台灣忍辱負重的努力雖佔去了很重要的部分，但國民黨的根，仍在大陸，就像台灣同胞祖先的坟墓都在大陸，他們無論遷來茲土數百年或數十年，身上還是流著中華民族的血，同樣的根仍在大陸。

民國締造，中國國民黨在革命的歷程中，曾有無數黨員參加國民革命軍，為國家而捨身取義，為歷史而留下了光榮不朽的一頁。繼之對日八年抗戰，中國國民黨也有無數黨員投入戰爭的行列，軍民傷亡達數千萬人，奠定勝利基礎，台灣始能回歸祖國的懷抱。歷史雖已渺不可及，我們不能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裏，也無需為歷史歌頌、或留戀歷史。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中國國民黨自然也在變。來台將近五十年的動亂歲月，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經歷數不盡的衝擊與考驗。有些變數，不禁令人感慨係之，譬如說，台灣光復之初，不少台籍人士，原屬日本國籍或用日本姓名，相繼的改為本國化，人們都樂道我是來自福建漳州、泉州，或我是來自廣東梅縣，如今卻變口：「我也是台灣人。」蔣經國總統在世時，也是如此說。當初家家戶戶都爭掛國旗、爭購國旗，視國旗為無上的崇高，如今在公開場合反而遭人焚毀，蹈之視若無睹。當初國語講習班的招牌林立，人人爭習國語。如今雖人人都能講國語，有人卻棄而不用，鼓其如簧之舌，講台語以自耀。當初從知識分子以至市井小民，紛紛申請加入國民黨，以此為榮，如今若干身為國民黨黨員，往往對人支吾其詞，反而不願曝光身分。當年黨國元老，死後相率於墓碑上刻有「中國國民黨黨員某某之墓」字樣，如今台灣雖荒塚壘壘，卻未發現有此字樣。這些演變，都是事實，我們無需為這些演變掩飾。

如果是失敗，我們便須坦誠承認。失敗並不可悲，可悲的是將失敗的事實掩飾，不去追究失敗的根源，自欺欺人。我們認為任何失敗，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這是說失敗須先檢討自己，追究失敗的種子，失敗的因素在那裏。過去大陸像風捲殘雲的失敗，原因雖多，黨的分裂，亦難自辭其咎。當時各據一方，暗中較勁，陷於地區權勢之爭，敵雖未至，而已先揖其門，豈能不敗。今日的情勢，我們自問如何？上次立委選舉受挫，已為國民黨亮出紅燈，如不及早認真的、徹底的檢討，仍然因循固執，粉飾以圖一時之安。只恐另一次失敗，又將重見覆轍。果能自我警惕，自我省悟，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對今年年底縣市長的選舉，或有裨益。我們實不容忽視此中變數。

回憶台灣光復時，日本留在寶島上的軍民共約四十餘萬人。次年（民國三十五年），政府規定分批由基隆高雄兩港搭船予以遣送回日。我在台北目睹日人一批又一批在風雨中整隊搭火車往基隆，無論日僑或日軍，他們如在承受戰敗的命運，嚴守紀律不氣餒。當時我便在想，一個戰敗國，有此軍民，顯示他們仍有其不可侮的潛在力，豈能久居人下。果然不出二十年，日本一躍為世界經濟大國，各國皆瞠乎其後。後來每年舉行的世界七大工業國高峰會議，代表亞洲的是日本，而非昔日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我們能漠視這個事實嗎？無論國家，政黨或個人，敗不足畏，敗便須敗得漂亮，敗得坦然，能有信心，能有毅力，終於挺起胸膛站起來。歷史上既沒有永遠的勝利，也沒有永遠的失敗，這是我們應有此共識的。

中國國民黨忠貞的前輩黨員，他們對國家、對黨所持的一份執著不移的

忠愛，來台後，都有陸放翁「死前恨不見中原」的沉痛心情，有的願埋骨於高山，死後仍盼遙望故國，有人願洒骨灰於大海，死後仍盼魂歸故國，黨有老成，令人無限懷念。後起雖不乏青年才俊，他們的愛國忠黨，絕不後人。但是，黨內卻因突顯著年齡、歷史背景、觀念、認知等不同因素的差距，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構成意見分歧，甚而互堅壁壘，並未像李總統所說的能發揮「生命共同體」的力量。自然，絕非國民黨之福。於是忠黨人士都以極度的關心，殷切的期待黨內都能集中意志，團結一致，能為大局著想，相忍為黨。誠如蘇東坡評論賈誼所說：「非天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今日國民黨何患乎無才，而這些槃槃大才何以發揮其智慧最高點，能為國家、為黨，所取者遠，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必有所忍，集千萬人為一心，取以自用，實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另一值得重視的問題，就是國民黨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很少在黨員心裏生了根。主義的思想精神，並未融入黨員們平時的言行。若干黨員入黨以後，一旦發現與個人權益牴觸，便不惜退黨，見利忘義，這是什麼黨員。如果黨的精神，蕩然無存，我們還憑什麼力量在劇烈的競爭中接受挑戰？

在野黨曾宣稱沒有萬年的執政黨，這是中外皆然的事實。但是，政權捨取操之於民意。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英國的工黨、保守黨，都是以民意依歸而輪流執政。國民黨目前處境，確已面臨險急存亡的保衛戰，如何保持既往的光榮歷史，當有待於能否精誠團結。

鄉先賢幽默大師林語堂生前曾用英文寫成「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的名著，享譽國際，漢譯為「吾國與吾民」，對中國的人民、文化、德行、心靈、社會形態、藝術、文學、人生哲學等，都有詳盡的描述，字裏行間流露不少愛國愛民的情操，而且提到個人主義，缺乏公共精神為國人的通病，至今仍如針對時弊，發人深省。我最欣賞的是他在自序中說：「人類對於真理的領悟，只在稀有的一剎那，這領悟的一剎那，倒是永存的，而不是私見能永存。」

國民黨現在處此險急存亡之際，圖存就是取決於一剎那能否領悟團結的重要，那是真理。我們如不能及時掌握林語堂所說的「一剎那」，黨內仍然分裂，仍讓私見存在，前面將是絕路，黨的前途將斷送於此。千秋功業，亦盡毀於此。

涉筆至此，使我想到先太岳嚴幾道遺囑中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之語，語重心長，對國民黨現況來說，無異肺腑之言，但願愛黨人士都能三復其言。

(原載八十二年六月十七日中國時報)

附錄

不容青史盡成灰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

本文作者葉明勳先生，於台灣光復時，以中央社台灣特派員身分，在台採訪，對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有相當深入的瞭解，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並親自採訪整個事件經過，直可謂身歷其境。鑑於各界追述二二八事件，偶有失實之處，作者特秉良知，以不偏不激的態度，追憶當年的感受，藉供讀者參考。——聯合報編者

我們處於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國家的處境也在變的今日。看看國際風雲的變幻，人心詭譎的紛爭，有時兀坐沈思，彷彿如被滿天陰霾的雲層籠罩著、窒息著，感受到的只有經濟繁榮，物質炫耀，生活安逸，人性暴戾，構成了那個光怪陸離，瞬息萬變的世界。人類的智慧，雖已竭其所能，昇華到玄妙莫測，最後仍然無法避免消失於歷史的隧道，各種善惡真偽也終於在那裡現形。以往鑒今，就是歷史留與我們的教育意義。但是，年輕一代對於這些陳跡，並不關心。幾年前，美國對高中學生曾作調查，發現他們史地常識的貧乏，幾乎笑話百出，如南美和歐洲的國名，很多東西莫辨，甚至南北戰爭，也有混淆不清，大概這是科技掛帥下的後遺症吧。我們年輕一代，是否也有同樣的缺憾，遠的不說，近的如對日抗戰八年的浴血奮鬥，大陸淪陷的慘痛，都能人人瞭解那些血淋淋的悲慘真相嗎？恐怕有人就視為這是塵封已久的歷史故事，渺不可

及，早已缺乏一份切身之痛的真實情感。大陸的淪陷，這個責任，似乎也應完全落在中國國民黨的身上，而對當時蘇俄卵翼中共的幫兇，中共背信詐騙的叛亂，與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反而一概抹煞，茫然無知。而且認為這些都與現實無關，現實的視野，已被利令智昏的功利主義所圍堵。只有那些以身受之的白頭中老年人才有此懷古的愴情而已。昔人曾有亡其國者先亡其史的警語，能不令人感慨係之。再說，台灣光復以後發展的情形，年輕一代，恐怕亦僅限於見其盛。譬如目前社會的繁榮安定，生活的富足改善，他們忽略那段艱辛努力的悠長歷程，那裏真不知凝聚著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豈能不加珍惜；同樣的，四十一年前，那次被視為歷史瘡疤的二二八事件，經歷世局滄桑之後，益覺迷離撲朔，任憑信口雌黃，作各種真偽莫辨的報導和推測。這種積非成是的流傳，以我一個身歷其境的人來說，慄於良知，想到早年于右任先生「不容青史盡成灰」的感慨，真有心所謂危的感覺。我們對於任何事件的分析或判斷，至少須從三方面來探討，就是對當局的認識、主觀的狀態與客觀的環境。二二八事件，如能先從這三方面來看問題，然後不難抽絲剝繭的找出癥結所在。這不是情感的，如果羈入情感的因素，便易產生偏差，對歷史真相的探索，不會是很正確的。

行政長官自嚴壁壘 管道淤塞，抱負難展

先說對當局的認識，當局就是對主政人物的瞭解。

我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偕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重慶首批飛抵台灣的，當時的職務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同行還有幾位新聞界碩

宿，現在多數已經老成凋謝了。所以，對光復後的台灣，瞭解不能止於浮光掠影。主政人物行政長官陳公洽（儀），也曾與我多次單獨談話。當他離台的前一日，又邀我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便須先談對他的認識。

陳公洽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早期的留日學生，據聞與日本戰犯東條還是日本陸軍大學的同班同學，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歸國後，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都曾任要職。主持閩政時，銳意建設，提倡國語，不乏具有突破性的作為。當時風評雖不一致，但福建從此貫穿了不少的公路，入境問俗，可用國語，都是事實。當他離職時曾慨言：「五年後，閩人當思我。」後來未到五年，閩人便在懷念著他，也是事實。他在萬方矚目下，啣命來台接收為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國土，當時都認為是最適當的人選，一則因他最瞭解日本，日本政壇亦多舊識。二則在地緣上他是與台灣唇齒相連的福建具有淵源的人。當他蒞任之日，步下飛機。便對記者們說：「我到台灣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他雖精通日語，但對台灣的日人從不說一句日語。台灣在他的心目中，這裏同胞們經歷了日人長期的統治和壓榨，飽嘗亡國之痛，一旦重歸祖國懷抱，最渴望的就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施政所追求的目標也以此為導向。譬如迅速的成立臨時參議會，重視民意，過去囚禁在火燒島（即今綠島）及各處的人犯，一律予以釋放，恢復自由。於是，在政治層面上頓然形成了全面解禁的景觀。從正面來看，人人如重見天日，享受著充分的自由生活。而在負面則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影響治安的工作，那些作奸犯科之徒，便在潛伏著乘機蠢動，為民衆生活帶來不安。而另一棘手的經濟問題，卻忽視這是大戰之後的社會，當時台灣物資缺乏，民生凋

敵，很多生產機構戰時已被破壞，未能恢復生產，導致失業問題不易解決。加以交通陷於混亂停頓狀態，對外無異自行封鎖，外貨既不能輸入，本身物資又匱乏，供求便已失去了均衡的作用。接收以後，政府的行政效率顯然運作不靈，呈現著無力感，許多失調的問題陸續的出現，都未能適時採取有效的對策。最顯著的是過去日人對生活必需品以管制、配給來控制戰時的物價，民衆喘息於高壓之下的生活，尙能苟安。一旦予以廢棄，又無外援的力量，於是商人居中操縱囤積，物價無法穩定，反而自亂步驟，直接的影響民衆的心理，民衆只重現實，並不瞭解政府的苦衷，對政府自然逐漸失去了信賴。其中另一因素，就是受日人的牽制，因爲日人在台灣已經根深柢固，忽然挖去了根，地位財產都已失去保障。這股力量，台灣同胞是無法取而代之的，它的影響，也是愛莫能助的。

這種情況，行政長官坐在望之儼然的辦公室中，能否瞭如指掌胸有成竹，都不無令人疑慮的。別人說他剛愎自用，就是說他是自信心極強的人。憑心而論，他的確將自己全副的精神都投入了公務上，他的生活，只能看到嚴肅的一面，沒有享受。中午留在辦公室裡，只要足以果腹的便餐也就足夠。他患有糖尿病，但並不重視自己的健康，雖然，這樣的圖治心切，部屬之間，諾諾稱是者則多，一士諤諤而具有諍臣典型者則少。於是，下情難以上達，很易築成了一道隔閡之牆。不但如此，就是高層次的管道，也往往爲之淤塞。譬如當時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先生，老成謀國，向他提出很多興革的建議，都未以行動證實他的採納。中國國民黨省黨部李主任委員翼中，亦未獲得應有的配合，遑論政通人和，同心協力。這些管道，如能運用得宜，有裨省政建設的發展，自然是相得

益彰的。但是，所見的卻是自嚴壁壘，事必躬親，缺乏那種天衣無縫、渾然天成的境界。合衆社記者，便曾批評他是「台灣之王」，因為當時的警備總司令是行政長官兼的，無異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語雖近謔，卻是頗爲傳神的。我們深慨政治真是一項高度綜合的藝術，有時只憑學養、見識、熱忱，仍然難以展其抱負的。所以，陳公洽雖爲重建台灣而盡瘁，但突遭二二八風暴以後，只得心灰意冷，擱置手繪的藍圖，剩下兩袖清風，黯然掛冠的回到上海了。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由希望而失望而反抗

至於主觀的狀態，台灣久經日人殖民政策的統治以後，一旦重歸祖國的懷抱，重見漢官的威儀，那種感激涕零，出於耿耿丹心的至誠熱忱，掀起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如火如荼的高潮，街頭巷尾，到處可見，感人之深，絕不是四十多年後出現群眾遊行的今日所能想像的。台灣同胞認爲光復後的台灣將是一個最理想、最開放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一切作爲，不再像過去備受統治者桎梏的迫害，可以隨心所欲的安享屬於自己的生活。但是，卻忽略了這是大戰之後，瘡痍未復，百廢待舉的世界。重建家園，必須以政府和民間共同的努力，無法立竿見影，一蹴可幾。當全省各處燃燒著慶祝光復的火燄逐漸熄滅之後，冷酷的現實，也終於無情的暴露了它殘缺的一面。

而且，自由民主的真諦，必須經歷長期的政治教育的培養和涉練，始能獲得全民的共識。光復之初，台灣同胞只樂聞自由民主的名詞，無異新生的寵兒，人見人愛，卻不知真諦在那裏，界限又在那裏。因而下層社

會經常發現借用自由，以民主為擋箭牌，行為上逾越了法律所賦予應有的範疇。如果不知守法，缺乏守法的精神，不以守法為基礎的自由民主，自然無異癡人說夢，幾近無知。然而，當時我們不能以此準繩衡量滿懷熱忱的台灣同胞，縱使四十多年後的今日，叫囂自由民主的人，又有多少人能自奉準繩，自我約束。何況當時剛跨出殖民地的第一步，面臨兩個不同型的社會，一切都是新的，新的觀念，新的標準都需要時間逐漸的教育，逐漸的培養，那些缺乏認識的現象，如今思之，只要出於真誠，也就不足以令人咄咄見怪的了。

日據時代，台灣同胞有很多優秀人才為日人所聘用，所以，任何機構都含有台籍人員，但屬於高層次的，仍然寥寥無幾。這是日人統治的政策，與真才實學是無關的。光復以後，政府處理的原則，一律留用。至於其他社會上負有聲望的人，政府未能廣為延攬，可能出於實際困難，譬如捨取標準，何去何從，而且擔任公務，對他們也不是很熟練相宜的。於是，只有借重他們在省市參議會上展露其才華。如果說這些遺珠之憾，構成若干的不滿或失落感，自然是無法避免的，也是屬於情感化的。事實上，凡是久居大陸的台籍人士，政府已儘量讓他們重蒞故土，為桑梓而貢獻其碩學宏才。

我們當時來台的人，彼此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台灣同胞對祖國的熱愛太感人了。這種熱愛，自然抱著無窮的希望，但當希望落空，或無法兌現時，希望成為失望，希望愈大，也就成為失望愈大，情緒隨而從高潮降為低潮。這些希望，為什麼落空，為什麼無法兌現，這是當時台灣同胞難以理解的。政府既未坦誠的公開說明，也未適時的加以疏導或安撫

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的大眾情緒。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的重視溝通，這是遺憾。

記得當時新生報曾有一篇社論，申述日據時代台灣同胞對日人統治的反抗，曾發生二十多次的流血事件，顯示台灣同胞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但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因爲不滿和失望的累積，就是怨尤，怨尤到了某一種程度時，就像石門水庫的儲水量過量時，必須洩洪，鎮壓等於臨時築堤，如果以此治水，必將窮於應付，這是有違祖先的遺訓。

有人認爲台灣同胞的倔強秉性頗與閩南地區的民情相似，遙想當年，他們的祖先相率追隨鄭成功飄海來台，乘風破浪，氣壯山河，內心都在燃燒著反清復明的火燄。這種火燄，寓有忠貞之氣，綿延百世，直到永遠。後來台灣各地不時出現的泉州、漳州幫派的械鬥，實質雖不同於反清，而所激發不容於他人侵佔的強烈自我主義，同樣的在熱血沸騰著。這種潛在力，我們不僅見於此，也見於目前的大陸各省，大陸淪共以後，或大或小的抗暴運動，爲歷史留下見證，就是有力的表現。小說家所描繪的民氣可用，亦即指此，大則可用於救國救民，小則可用於私人集團，鼓勵群眾，供其驅策。我們習聞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是禍是福，關鍵決定於領導階層掌握的方向正確與否，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都在一念之間，後果絕不是當初所能逆料的。

抑且，群眾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二二八風暴，有一些失意而具有政治慾的火爆性人物，利用群眾對現實的不滿、失望而滙合的激憤，從中煽動、蠱惑，造成缺乏理性的盲目暴亂。暴亂的目的

在那裏？是衝動，是被利用，也許永遠無人提出正確的答案。既然形成暴亂，政府為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人民的安全，我們也無意苛責以武力鎮壓。因為演變至此，古今中外，也很少不以出之以武力來應變的。

民情缺乏溝通疏導 禍起基層，遺恨何及

最不可原諒的，就是街頭巷尾，居然有人高唱日本歌，舞著武士刀，幾乎忘卻自己是炎黃子孫，身上流著是中華民族的血液。這種與日本浪人無異的行徑，有人認為這是日人蓄意助紂為虐。根據資料探索，日本戰敗之初，旅日台灣同胞四、五千多人，半數以上是沒有戶籍的。三十五年由日遣送回台的二二七人，其中部分並不是參戰的，而是當年的特級流氓，日人訓練他們到大陸去當最壞的角色，目的有三：一是壞事做盡，替日人頂罪，二是破壞對台灣同胞的情感，三是困擾台灣的治安（見五二年四月份文星雜誌）。像這樣充滿炸彈性的火種，投入台灣，我們雖未盡信，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當年被徵參戰遣散回台的人，先後約略有三十萬多人，他們的就業問題，政府缺乏妥善的照顧或安排，像這樣血氣方剛的人群，一旦遊手好閒，自然構成社會問題。有人認為這些問題與流氓的未能肅清，也是導致二二八風暴的另一因素。然乎否耶，治史者不能不予重視。

至於客觀的情勢，我們初履斯土時，都會驚訝日人銳意經營所花的心血，雖然他們的政策是殖民的，但無疑的已向現代化的里程邁步著，這是備受戰火蹂躪的大陸各省所不能及的。可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裏首當其衝，迭遭盟機的轟炸，到處只剩下百孔千瘡的殘垣斷壁了，——

尤以總督府最為突出。戰爭在人間最殘酷、最淒涼的一面，真是令人不堪回首。台灣同胞雖未淡忘那段逃警報、啃地瓜，日夜驚惶的艱苦日子，但一旦光復來臨，他們以過去視為恍若隔世，如從黑暗走到光明，如在重獲新生迎接著幸福的歲月。所以，現實仍然是浩劫之後，滿目瘡痍未復的世界，也被大家太情感化的忽略了。

一年以後，慶祝光復的熱潮，已經逐漸的消褪，面臨新的生活環境，一切是陌生的，希望獲得的也不是很滿足的。於是，有人便在開始不滿或失望。而這裏卻包含著兩種潛在的因素。其一，接收人員都來自大陸，他們對台灣還是很陌生的，各種行政管理、程序及手續，都是搬運大陸那套積習已久的老舊架構，適用與否，未加深究，既不瞭解日人所遺的成規，也無法革新汰舊，行政效率因而面臨新的考驗。從主管到基層，都缺乏新的精神、新的作法，未能做到真正換血的工夫。那些沓泄因循的積習，仍未根除。於是，各種青黃不接，便無以善其後。其二，日人已成爲戰敗國的日僑，都須遣送回國，未被遣送的日僑，只有寥寥無幾的專門人員而已。這股龐大的人力騰空以後，多少機構形成了真空的狀態，尤其生產機構，萎縮的生產力，一時難以復甦，加以戰時的破壞，益見支離破碎。我曾參觀過一些機構，設備破損，人員零落，一副爛攤子的印象，至今尚在。所以，顯示人力是需要充實的，而另一面失業的問題仍然普遍存在，日人被遣送後，接充人員，政府也許考慮事實困難，似乎並未在台灣同胞中廣爲羅致，在情感上，就是很容易造成隔閡的。如這些問題，政府的處理，顯然缺乏公信力。也就是說，當此過渡時期，不少脫節、紊亂的現象，政府都未能落實接收的工作。所以，面對困境，很難出現新的拓展、開創另一個新的局面了。

政府這些實際的困難，台灣同胞是十分隔閡的，也是無法獲得理解的。

至於接收人員留與台灣同胞的印象，人人都具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儼然是漢官威儀嗎？當初來台接收的人，據聞曾經流行著「一流人才做二流事」的口號，就是希望都有好的表現，能為台灣同胞塑造好的形象。只是軍公人員太多了，那麼多的人，都能自律自愛，以此自許，畢竟是憂乎其難的事。尤其基層人員，有些積習難改，仍殘留著官僚時代的壞習氣，便成為害群之馬。如二二八前夕的緝煙事件，誤傷行人，即其實例。如能具有今日只許挨罵，不許還口的憲警涵養，區區緝煙小事，何至形成野火燎原，一切暴亂自然早已消弭於無形。遺憾的是最接近民衆的人，就是這些基層人員，接收人員的形象，也許就被他們的顛預無知和不能自檢的行為破壞了。

我們都知道首先令人失望的，就是看到第一批登陸基隆的國軍儀容，他們的服裝都很破舊；那裏像一支堂堂的勝利之師。殊不知我們的八年抗戰，就是憑這樣的隊伍與日軍衝鋒陷陣，與日軍作殊死戰，台兒莊諸役，也是憑這樣的服裝擊敗日軍。但是，那些祖國以血肉之軀而抵抗的苦撐日子，所流的血、所吃的苦，都不是海天遠隔的台灣同胞所能瞭解的。當時大家看到這些登陸的士兵，應該是像看到劫後的破碎家園，不是失望，而是感慨。多難的祖國，它為抗戰承擔太多的災難了，戰勝日本的不是武器，而是正氣，而是潛在的民族精神和毅力。這些感慨，自然也絕不是當時台灣同胞都能心領神會的。

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別，本來無此界限。光復以後，街頭巷尾，到處掛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台灣同胞，無分男女老幼，都在詰屈聱牙的學

習著國語，而接收人員也能熱情的學習著閩南語，彼此相聚，如見遠客，其樂融融，從無隔閡，自然談不上什麼地域觀念。新生報於光復一年後，曾作饒有意義的統計，就是日人雖然統治台灣半個世紀，但台灣同胞在一年之間與外省人通婚的紀錄，卻超過了半世紀與日人通婚的總數，顯示彼此的情感是多麼的水乳交融。二二八事件以後，後來外省人三字，竟成爲很突出的敏感名詞，而且還沾上一點政治意味。這是從何說起，如果說對政府有什麼不滿，因政府裏辦事的多屬外省人，便歸罪於外省人，但外省人並不代表政府，當時全國各省的公教人員，也沒有一省都屬於本省籍的，自然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從知識份子到農村，似乎都沒有這樣的偏見。也許這是居心叵測的人所製造的名詞。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北方居民大舉南遷，如五胡亂華，如金人侵宋，他們從遙遠的黃河流域，扶老攜幼的避亂南遷，所到地區極廣，後來都在當地生根，從未聞有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別。閩南語的母音，根據音韻專家之言，具有中原的古音，以此推論，來自閩南的台灣同胞，其祖先何嘗不是來自中原。如果尋根，我們的根，可能都是源於那個遙遠的中原。中華民族所以能成其大者，就是因能凝聚攝取各方面的潛在力量，爲外力所不能奪、不能移。台灣後來的經濟繁榮，舉世刮目，答案也就是在此。如今山河淪陷，紅禍橫流，大陸人士，相率來此，又像歷史上的大舉南遷。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事實上，無異過去泉州、漳州的糾葛翻版而已。

往者不可諫，須爲歷史尋根，毋偏毋激

以上所敘就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個人對當時台灣情勢發展親歷其境的感受。四十年動亂多難的歲月已經遙遙而去了，台北市歷經滄海桑田之變，昔日那份海天寄跡的幽思，已為物質文明的浮囂所取代。二二八的噩夢，也已渺無痕跡。但對年輕一代，仍如一團疑雲，這裏特敘真相，作為註解：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七日晚，專賣局緝私人員六人偕警員四人，至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女販求情未許，民衆圍觀，群情激憤，混亂中開槍傷及路人，群衆擁至警局，要求懲兇。

——次日二十八日，群衆聚集龍山寺、延平南路遊行，繼至專賣總局，又至分局，企圖搗毀。中午擁至行政長官公署（即今行政院）門口叫囂，被迫開槍，作鳥獸散，所遺木履近百雙。下午繼續遊行，見外省人便打，台北幾成恐怖世界。復佔奪公園廣播電台廣播，警備總部宣佈開始戒嚴。

——三月一日，台北市參議會邀省議員等組緝煙調查委員會，推選黃朝琴等向行政長官建議善後處理問題，長官即向民衆廣播，答應建議。

——三月二日，暴亂逐漸蔓延全省各地，外省人到處被毆，成立處理委員會。

——三月三日至七日，如進入暴風圈，暴亂不斷擴大，長官公署惟有不斷的讓步。

——三月八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同憲兵第四團兩營由福州抵基隆。

——三月九日，國軍二十一師由上海抵基隆鎮亂，至十三日，發生抗

拒，多有傷亡。

—三月十四日，警備總部公報：「開始肅奸工作，希望民衆檢舉密報，全省綏靖工作進行順利，各地臨時組織已自動解散。」

—三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蔣經國處長偕行，至四月二日，離台返京。

—四月二十九日，行政院宣佈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爲台灣省政府，首任主席魏道明於五月十五日抵台。

此次暴亂，當年台北市長游彌堅認爲這是很小的事件，因爲大陸各省類似這種偶發的緝私糾紛，已經司空見慣，但在台灣卻成爲很高震撼性的風暴，實非意料所及。中共方面近年曾多次叫囂，認爲這是他們所導演的傑作，中共雖以暴亂起家，但當時他們還是不成氣候，謝雪紅之輩，乘機插上一腳，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影響力。中共無非藉此大攪統戰，欲以惑亂國際視聽而已。所以，我們無需予以重視。

去年（七十六年）四月間，美國亞洲學會在波士頓舉行第三十九屆年會時，曾將二二八事件列爲討論主題，經過賴澤涵、馬若孟、魏萼三位教授以兩年半的時間，從台灣到國外廣爲蒐集有關資料，並訪問當時政府與地方的有關人士，也曾到過肇事地點勘察。他們兩易其稿所作的結論，認爲此次事件，與民國二十三年山東威海衛所發生的暴亂頗爲相似。威海衛於一八九八年租與英國，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歸還我國，由於思想、觀念的差異，當地居民產生了很多次的反抗行爲，背景與當時的台灣頗爲相似。

我以一個身歷其境的人現身說法，從廟堂到市井之間所獲的感受，認為這是對現實不滿的一次逾越的反抗行動，對現實為什麼不滿，其中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觀念的、心理的等潛在的因素，具見前文所敘。這些因素由於對當時社會的突然改型，對戰後的生活環境，對政府的施政初衷，都缺乏充分的、理性的瞭解和認識，以致形成了隔閡的鴻溝，復因失望而導致誤會，缺乏溝通的管道與紓解的力量，於是，鴻溝的裂痕日益擴大，終於難以遏阻。自然，無可否認的，另一股主導的反抗力也在驅策著，這是熱中於政治而未能逞其私慾的具有反抗性人物作祟，他們利用群眾對政府失望的直覺激憤，加以煽動、蠱惑，因而如波助瀾，轉而成爲一次缺乏理智的暴亂。後來，中共的羽翼，與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在意識上，沒有目標，並不包含什麼分離主義。台獨一群欲以自吹自擂，也想將此次事件扯上了關聯，與中共所玩的統戰把戲，同樣的都是一副小丑嘴臉。

歷史的教育意義，就是曉諭後代子孫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放眼古今中外，任何歷史的軌跡，都遺留著殘缺或醜陋的一瞥。我們不必諱言殘缺或醜陋，因爲這是警惕，負面也是同樣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在渺遠的歷史隧道中，那是不可能重現的陳跡，與現實已經永遠的隔離。所以，我們無需擔憂，無需抱憾。現在，我們於四十一年後的今日，追溯二二八事件，也須以同樣的心情，只希望為歷史尋回失落的一面。至於追究責任等說法，這是對歷史的責任，對歷史的交代，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千秋自有定論。最後我們還須補充一提的，就是當時抗戰在急轉直下的情勢下勝利，政府在遍地瘡痍中忙於接收，各地接收情形，遭受中共嚴重的毀詆或破壞，國人昧於真相，容有爲人所

詬病。但在台灣大體上步驟是未亂的，都希望去做好的。如果既非身歷其境，只憑傳說臆測，便將一些失實的史料刺激年輕的一代，自然有違歷史的良知。所以，年輕一代對歷史必須求真求實，像胡適之先生一樣的重視事實的根據，追究到底。但是，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那裏？很多人既不知什麼是二二八事件，政府至今仍缺乏有系統的完整記載，公諸於世。去年因逢二二八四十周年紀念，從美國到台灣都有各種的追記或評論。探秘發隱，的確有不少的琳琅滿目的大著，可惜很少是身歷其境，缺乏真實的體驗，那些洋洋大作，未免就有失實之處。回想于右老「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警語，青史成灰，畢竟是人間莫大的遺憾。時光易逝，轉眼又是一年，撫今追昔，本文之作，但求秉於良知，不偏不激，不隨不阿，寫出個人感受。我雖非歷史學者，卻願能為年輕一代揭露歷史真實的一面。

(原載七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聯合報)

後世忠邪自有評

——從陳公洽談到二二八事件

自從監察院公佈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當年二二八事件的報告之後，衆議紛紜，萬方矚目，社會各界廣泛的掀起了各種不同的迴響。當時最重要的關鍵人物，當然是主政的行政長官陳公洽（儀）。他在離台以後，前往南京轉往上海便住在湯恩伯的寓所，也進入了中山醫院治病。三十六年夏，我在赴京述職回台路經上海時，曾到醫院去看過他。談到二二八事件，不禁黯然動容，認爲這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失敗，也是平生難以彌補的缺憾，對於外界對他的種種批評，都未置可否，只見感慨溢於言表。今日回想四十年前的陳跡，真是百感交集。撰寫此文，既不是秉於春秋之筆的大義，也不是含有任何蓋棺論定的褒貶之意，只因歷史的情感鬱結而成爲胸中塊壘，似有一份良知在驅策，雖然我已寫過〈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文，但覺意有未盡，仍欲一吐爲快。自愧為新聞界老兵，落落一生，無補時艱，多少前塵往事，回首惘然，都已渺如過眼雲煙，只願傾其往昔之所知，爲關心歷史者正告，視之西窗夜雨話舊的題材，固無不可，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資，亦屬無妨。

松井石根之言，促成陳公洽主閩

細數陳公洽的平生，最重要的階段，一是在福建八年，一是在台灣二年，遙想當年，風雲際會，政府爲什麼任命他爲福建省主席，則須追溯

到平定閩變前後的政壇動態。閩變者，就是民國二十二年李濟琛、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以抗中央。以整個情勢而論，只是政壇上一瞬即滅的泡影，並不是什麼驚濤駭浪。未及一年，即告平息。當時九一八事變發生已經兩年，日本包藏禍心，侵華日亟的猙獰面目也已暴露於世。而政府則在忍辱負重，勵精圖治，基本的國策是先安內而後攘外，東南各省，因離剿共的地區稍遠，積極的建設，各地情形，可以說是很安定的，也是很繁榮的。那段歲月，就是後來爲人稱頌的大陸時代黃金十年。閩變發生後，附近各省都未受影響，只有隔海相峙的台灣，已被他們所拉攏。政府爲求救亂，自然也須早日扭轉台灣的情勢。於是，便由李擇一銜命來台，李氏早年留日，爲國內知名的日本通，日本政壇且多是他的舊識，台灣軍區司令長官松井石根即其中之一。當年舉國側目的塘沽協定等對日重要的商談，李氏也無不參與。其時 蔣委員長坐鎮南昌剿共，因楊永泰之推薦，始受知於蔣委員長。李氏既銜命來台，便化裝爲日人，另邀兩日人同行，由上海搭輪先至長崎，然後來台。不料抵台之後，日人政府方面已爲閩變同黨所包圍，不得其門而入。後來透過當地名紳辜顯榮的關係，始由辜氏邀請松井石根於其寓所與李氏晤面。辜氏當時雖爲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但對隔海的祖國仍有一份依戀之心。九一八事變後，蔣委員長曾授意辜氏，希冀他能從中排解日人的侵略野心。所以，辜氏曾由他的三女婿黃逢平陪同到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先後晉謁蔣委員長與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前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談話的記錄，光復後仍爲其哲嗣辜偉甫所珍藏。李擇一台灣之行，果然不辱使命，經其陳述利害以後，松井石根已允支持國民政府，談話之間，松井石根並問及陳公洽近況如何？李氏便以陳爲當時的軍政

部次長相告。當他馳電向蔣委員長覆命時，即提到松井石根對陳公洽關懷之意。閩變平定後，政府為重視福建對台灣的關係，從各種跡象分析，松井之言，與任命陳公洽為福建省主席多少是有關的。

陳公洽主持閩政後，民國二十四年，日人為紀念統治台灣四十周年，特地舉辦了一個博覽會，藉以炫耀他們在台的建設，總督中川健藏曾邀陳公洽前來參觀。他搭乘逸仙號軍艦由閩抵台，自然貴為總督座上之賓，總督官邸（即今台北賓館）一時冠蓋雲集，日人在台那副統治者的傲態，也盡入他的眼底。十年後，台灣光復，陳公洽以行政長官重臨舊地，他所不喜的總督官邸，那副豪華的氣派，仍未淡忘。所以，當初他的官邸，不設在台北賓館。而另選於台電公司日籍董事長的舊居。二二八後，始遷延平南路。兩地居民，因而常見那位樸實無華的日籍長官夫人，提著籃子去買菜。據聞大陸淪陷不久，她便已悄然返日，生活清苦，舊屬任顯群等人，曾予濟助。

那幢曾為台電所榮寵的官邸，後來由台電總經理劉普鈺遷入，但因陳劉二人都不得善終（劉因共諜案正法，同時有台糖總經理沈鎮南等人），從此人去樓空，視為凶宅，誰也不願再搬進去住。其地在今台北市和平東路台電總管理處舊址附近，已改為診療中心，話舊者每為歎歎不已。

信賴沈仲九，陷入紅色泥沼，種下禍根

陳公洽在福建致力建設，雖不乏績效，但不能稱為成功，主要原因不出於：一為處理人事問題，一為財經政策失當。前者因所任用的主管人員，多數屬於江浙地區的人，很易引起具有鄉土意識的當地人士反感。

而後者，尤以厲行實施管制所設的生產局、公沽局、運輸局等機構，影響物價波動，最爲各方所不滿，當時雖有戰時的因素存在，但現實未爲大眾所接受，遂貽人以指責的口實，甚而產生歧見。南洋僑領陳嘉庚，因曾創設廈門大學及集美學校，爲朝野所重，他以關懷桑梓心切，對當時的省政便提出不少嚴厲的批評與責難。政府因時值抗戰，重視團結，需要華僑的支持，於是導致三十年的省府改組，主席易人。

陳公洽的處理人事問題，雖未因主管的籍貫便顯示他有地區的觀念，但是卻充分的暴露他的剛愎自用的個性。譬如當時國民政府林子超（森）主席曾推薦兩位久孚衆望的閩人爲廳長，一爲民政廳廳長高登艇，一爲教育廳廳長鄭貞文，據聞當時福建省內的任命各縣縣長，有的竟不爲民政廳廳長所知，同樣的，各校校長的任聘，也有不爲教育廳廳長所知。又如財政廳廳長張果爲因反對他的厲行管制政策，便不爲他所悅，掛冠而去。這種作風，自然不會令人心服，也只有爲他自己種下失敗之果。他在用人方面，還有的特點，就是一爲重視訓練人材，很多的基層幹部，都是出於省府所辦的訓練所，只要受訓時表現傑出，都不難擢升爲高級幹部。一爲對部屬鄙視小報告，相傳有出任海澄縣長者，深知他的好惡。便先爲自己偽造一連串貪污劣跡的小報告，不斷的投向主席辦公室，真像曾參殺人，不得不疑，後來終於下令徹查，結果並無其事，此人暗喜計已得逞，便玩起真的，密告到時，自然成爲「狼來了」的翻版，省府無人肯信。這個故事，給人的省思，就是曾國藩所說知人之難。凡在領導階層，用人不疑，與鄙視小報告都是值得欽佩。但一旦君子與小人不辨時，君子則有所不爲，小人則無所不爲，善惡互異，偶而不察，禍至無日，當代之爲官者，真是不能不謹慎了。

陳公洽因深信部屬，錯用了人，不免僨事而未能自覺者，此只一例。他在這方面無可挽回而鑄成大錯的莫過於過份信賴沈仲九，爲自己種下殺身的禍根。沈爲思想左傾以無政府主義自詡的人物，陳公洽從福建到台灣，以至後來的浙江，對他無不言聽計從，寵信有加。他在福建時，名義雖只省府顧問，但在幕後卻操縱了人事大權，很多的人事部署，隱然都是出於他的主意。施政方面，也是同樣的具有影響力。所以，陳公洽遭人之怨，他自然應該負責的。其人爲一典型的紹興師爺，亦頗似古代弄權誤國的宦官之流。陳公洽雖是自信心極強的人，不料他的左右，竟有這樣口蜜腹劍，深藏不露的奸宄，居然毫無警覺。他的思想，從此逐漸的陷入紅色泥沼，沈浸日久，終於難以自拔。據聞當他出任浙江省主席後，省府之內，便有不少的共黨份子潛伏著，有些還是追隨多年，平時從未發現的人。從丁名楠投書湯恩伯事件來看，據丁自述，臨行時曾看見沈仲九臉色深沈的坐在那裏與陳公洽密談，所謂局部和平，大概又是出於沈的傑作。所以，論者嘗以陳公洽終其一生，爲沈仲九所害，其然，其不然耶！

我們如觀察一個剛愎自用的人，歷史上有許多的暴君，就是屬於這類典型的人物，成功者並不多覯，而失敗者結局都是很悲慘的。陳公洽自然也是接近這類典型的人，而且具有雙重的性格。一則自信心極強，獨斷獨行，在他的字典中，找不到可以解釋自己錯誤的字。所以，他缺乏從善如流的坦蕩胸襟，別人的意見，當然不易接受。他的部屬，難覓一士諤諤，風骨嶙峋的人物，卻是常有巧言令色，諾諾稱是的鄉愿之輩，最易築成一道無形的隔閡之牆，受損豈止言路阻塞，下情難以上達，一旦失察，貽害無窮。二則他如信任某人，便像信任自己一樣的不爲忠言所

動，上述所舉的實例，都是患在不能識人，疏於明辨所致。試想諸葛亮、曾國藩絕不是剛愎自用的人，否則街亭之失，諸葛亮豈能深悔未遵劉備之言，錯用了馬謖。才高如左宗棠，也不會推崇曾國藩有知人之明。天下事，成敗得失，往往取決於能否明察的一念之間，當韓信以叱咤風雲的氣概戰敗項羽於垓下時，絕不會想到自己後來竟喪身於未央宮。同樣的，陳公洽於主持台灣受降典禮時，面對著萬眾歡騰的情景，不可一世，也絕不會想到自己後來竟如此的下場。陸放翁詩云：「中原成敗寧非數，後世忠邪自有評。」歷史昭示於後代者，能不慨然有感。

對外淤塞溝通管道，一意孤行

陳公洽主政台灣後，當時舉世無不寄以殷切的期待，因為台灣是淪於異族而重光孤懸海外的國土，都望能有突出的表現，新的面貌與國人相見，因他的敢作敢為，先總統 蔣公對他亦倚畀至切，私人信札，都以畏友相稱。然而，他的作風與主持閩政時如出一轍，並無顯著的差異。行政長官公署各處的主管，仍以福建的老班底為主，計民政處處長周一鶚、教育處處長趙乃傳、財政處處長嚴家淦、交通處處長徐學禹、工礦處處長包可永、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警務處處長胡福相、秘書處處長錢宗起、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方學李、會計長王肇嘉、統計長李植泉、人事室主任張國鍵。陳嘉庚雖遠在天涯，聞悉之後，便滿腹牢騷，大為不滿，立刻馳電陪都重慶當局，提出異議，理由是與閩台一家的旨意大相逕庭，所用閩台地區的人太少了。中樞至為重視，據聞此事經有關方面的協調，乃商邀中訓團高級班結業的閩南

籍而為當時重慶特別市財政局局長的張延哲，出任台灣財政處處長。張延哲之受知於陳公洽，便始於此時，後來且至浙江，出任省府秘書長。當初原定人選，因徐學禹已受聘於招商總局的總經理，乃調嚴家淦為交通處處長。光復後數月，長官公署雖已積極的展開接收工作，但秘書處處長仍空懸，因原任處長錢宗起已出任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署長，無法到任。陳公洽便將張延哲調為秘書處處長，遺缺仍調回嚴家淦接任，交通處處長則另由任顯群繼任。教育處處長因趙乃傳回北京大學任教，改由范壽康接任。這是壽命僅一年又六個月的行政長官公署人事部署的始末。

陳公洽的處理人事問題，從福建到台灣，都不免遭人非議。留下的敗筆，不但有損他的政績，也為當時構成了後遺症。長官公署所設的委員會，除上述宣傳、法規兩會外，尚有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由陳公洽自兼，副主任委員則由福建權傾一時的沈仲九擔任，儼然仍為他的智囊團。李擇一因有助於陳公洽的宦途，雖被聘為長官公署顧問，或因出於酬庸性質，未受重視。加以此老習慣於東洋的情調，不拘小節，酒家經常有他的踪跡。在陳公洽的眼裏，自然不如一襲布衣，老謀深算的沈仲九能投他之所好了。所以，李擇一對他的各種建議，縱有滿腹經綸的匡時良策，亦難獲得青睞。而且因對沈仲九的過份信賴，反而為他自己淤塞溝通的管道。這種管道，在現代政治的運作上是很受用的，也是很微妙的，陳公洽不能稱為此中高手，缺乏那種恢宏豁達，有容乃大的政治家風範。思想雖很進步，作法卻是極不進步的。譬如招待中央大員李文範、居正等蒞台，地點必在台北賓館，陪客必是長官公署的處長，從不變更。有人便諛稱他如軍事操練的一二三四開步走，呆板得很。雖屬小

事，顯示他的性格，在政治上，同樣的形成了不能靈活的運用。加以身兼警備總司令，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一切唯我獨尊，認為台灣從政治經濟到一切的措施，最理想的就是實踐一元化。中央軍可以撤離，只需保安隊維持秩序即足，現有駐軍，可調到大陸參加戡亂，銀行只需一家，發行當地通用的台幣即足，政府的報紙也只需一份，能代表發言即足，其他設施，無不如此。他認為惟有如此，台灣始能成為理想的天堂，不受大陸戡亂戰爭之殃。所以，合眾社的洋記者，稱他為「台灣之王」。古代以王者犯之易怒，喻為逆鱗，逆鱗雖不見於他，而他的頑同，別人不願犯之，也是事實。於是，促成他無法接近群眾，無法瞭解民瘼，更無法像蔣故總統經國先生那樣的深入民間，深入基層，只能侷促周旋於辦公室的小天地中，這是他失敗很重要的潛在因素。

再說凌駕於各處處長之上的秘書長葛敬恩，陳公洽視之應如股肱，他是當年孫傳芳麾下某單位的參謀長，也是陳公洽投向國民政府的引線人物。但他的輔弼功能，並不顯著，在陳公洽的心上還不如沈仲九可以視如心腹。當時領導各界有關人員首批來台的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主任也是葛敬恩。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有幸與他同機，他的表現，未免令人失望。當五架專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這是什麼漢官威儀。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台北的天空，首次飄揚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這又是多麼富有意義的時刻，他又稱病不出，躺在基隆河畔的南方資料館（後為美軍協防司令部）休息，責任竟推到副主任范誦堯的身上，那次盛會主席，反而由外交部特派員黃

朝琴來擔任。他的作為，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後來大陸淪陷，據聞腆顏投共，且早已含恨九泉。當年陳公洽既託以重任，大權在握，卻未能沆瀣一氣。

缺乏人際關係，理想成空，千古遺恨

台灣雖淪於日人的統治五十年，李鴻章於割地時，揮淚稱其為千古傷心之地，殊不知台灣的內在精神，仍然屬於中國的台灣。日人憑他們侵略的手，所能改變的只有外在的建設，與有形的風貌而已。所以，光復之初，我們無論走向民間，或走向鄉村，到處都可發現純然出於中國傳統的習俗仍在台灣同胞生活中生根，代表中國精神仍隱藏在那裏閃爍著、活絡著。然而，陳公洽並未能與這份內在的精神，融為一體，產生交流的作用。也就是說他在政府與民衆之間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與台灣士紳們沒有以誠相許，推心置腹的情感。自然，也是他失敗因素之一。譬如德高望重的林獻堂，他在台灣的社會地位，當時很難找出足以相提並論的人物，如黃朝琴、林柏壽等，他都視之為後輩，也是當時從目擊台灣割讓到光復，僅存的身歷滄桑的耆宿，滿腔的愛國熱忱，且曾率團到南京向政府致敬，誰知竟未為陳公洽所重視，缺乏應有的禮遇，連最早的省參議會議長也不請此老出馬。後來林氏前往日本，久客不歸，鬱鬱以終。與林氏同樣被忽略或有失落感的人士，恐怕還有不少。當時地方士紳對祖國所懷的熱望，已至沸點，這是鐵的事實，為什麼後來竟連續的產生失望或反感，原因何在？這是需要嚴正的檢討。陳公洽卻從未注意事態的嚴重性及其所能導致的發展，這個責任，毫無疑義的他是應該

承擔的。

陳公洽在台主政未及兩年，他的功過如何？如今視之，彷彿無一是處，只有一連串的過失。憑心而論，他確愛台灣，也愛台灣同胞，確有抱負，也有理想，當他蒞任之日，便曾提出三不主義，以勉部屬，三不就是不說謊，不偷懶、不揩油，希望建設台灣成爲模範省。但是，他卻徹底的失敗了，比起離開福建時，失敗得更慘，摔得更重。此中因素，經緯萬端，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主要的他忽略這是從被統治、被壓迫而改道而走向另一民主自由的殿堂，而且這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失調的、百廢待舉的社會，處理經濟問題，尤其不能移用福建那套曾經失敗的管制老辦法。政治全面的解禁，也是忽略這裏的民主自由，還是新生的寵兒，成長尙待教育與培養，都是欲速則不達。而陳公洽卻求治心切，操之過急，只求實現理想，政府與民衆之間，始終缺乏可以溝通的管道或橋樑，民衆既無法瞭解政府所負全面更新的接收重擔，而政府又漠視民衆切身的問題在那裏，失望反感又在那裏。加以他那種剛愎自用的性格，只知一意孤行，未能與當地人士和衷共濟，培養和諧相忍的祥和之氣，共謀對策。所以，他雖勤政而不知親民，這種隔閡的鴻溝，只要存在，便會逐漸的擴大，便會像火種的潛伏著，隨時可以觸發。二二八事件，只是有人在引出導火線而已。他的理想，便成爲空中樓閣，瞬息幻滅於冥冥的夢寐世界了。所以，有人說他雖愛台灣，卻不知怎樣的去愛，愛的不得其法，這是千古遺恨。

要忠恕，要寬厚，毋爲親者痛

二二八事件，過去我所發表的拙文，只寫出個人親歷的感受，並未涉及當時動亂的真相與傷亡的人數，因為我認為這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後來陸續的拜讀了不少有關的宏文，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不禁戚戚然而有所感，願坦誠、率直的提出補充說明，以就教於高明：

（一）當時傷亡的人數，官方的資料既不一致，民間更無可信可靠的統計數字，事隔四十一年之久，恐怕很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我們重挖創痕，實無多大意義。目前未到六十歲的人，都無法身歷其境，當時的真相，絕不能輕信人言，以訛傳訛。

（二）有人說傷亡多屬台灣同胞，此非事實，當時我曾隨監察使楊亮功、救總分署署長錢宗起同車至各醫院慰問療傷的受害人。這是我一生中僅見的悲慘鏡頭，台北不但是死城，也是空城，街上一片死寂，只有幾條野犬在那裏亂嚼著被人打死的屍體，屍體上沾滿鮮血，慘不忍睹。這些人都是從外地、或居處來到台北街頭，忽而禍從天降的被人毆打。當時據聞只能說閩南語或日語，都是難逃劫數，必須兩者都能，方始驗明真身，可以倖免於難。他們不死於對日抗戰，而死於光復後的台灣，言之痛心。

（三）我們必須認清的，當時的情況，無論怎樣的殃及無辜，到處有人被打，但究限於極少數人的劣行，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仍然是善良的，厭惡暴力的。他們為外省人維護安全，為外省人解決困難，或挺身而出，或暗地安排，到處可見可聞。如嚴家淦處長在台中被霧峰林家救出險境，就是一例。而且有不少感人的事蹟，為同胞愛在混亂中披露了光明溫暖而極可貴的一面，這是極值得欣慰的。

(四) 歷史上多少流血的不幸事件，都與主政者有關，此一痛心的往事，政府當時措施失宜，論責任自然須由行政長官陳公洽向歷史交代。我們中國傳統的美德就是忠恕、寬厚與忍讓，四十一年前的陳跡，往者已矣，多言何益。我們絕不能以此一事件，造成親者痛、仇者快。涉筆至此，不勝馨香默禱之至。

(原載七十七年五月七、八日中國時報)

聞道長安似弈棋

——略記台灣光復初期陳儀、林獻堂、董顯光三人物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佈投降後，陳公洽（儀）受命為台灣行政長官翩然來台，主持台灣地區受降典禮，並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在台執行他的長官任務。漢官威儀，名傾一時。不料未及兩周年，民國三十六年，便以二二八事件，禍起於倉卒之間，群情責難，終於黯然掛冠離開了台灣。去年我曾以〈不容青史盡成灰〉、〈後世忠邪自有評〉（見二月二十九日聯合報、五月七、八兩日中國時報）為題，撰文詳述當時身歷其境的感受，與分析導致事件發生的各種因素，並對陳公洽有所評論。如今陳氏墓木已拱，觀音山蔓草叢生，空山落寞，憑弔無人。緬懷他的一生（一八八三—一九五〇），雖蓋棺而至今尚無論定。如以治台一段經歷來說，研究歷史的人，有褒有貶，有的且讚譽他有魄力，能擔當。他的舊屬，大致都說，台灣光復後，陳長官望治心切，如將所有過失都歸咎於他一人的身上，這是不公平的。自然，也有人將一切的錯誤或失敗，都要他一人來負責，而且責以晚節不保。憑心而言，當年無論識與不識，是友是敵，都不能否定他的有守有為。廟堂之上，佩虎符，坐臯比者，像他這樣有抱負，有理想，能實幹而無視於權貴的人，確屬少見。

但是，他的剛愎自用，縱恣不羈，也是爲人詬病指責的一面。這是由於他的主觀性太強，太固執，太自信，缺乏禮賢下士，不恥下問的恢宏器度，以致不易與人溝通、不易接納群眾。從福建到台灣，他的掛冠，同樣的遭人非議。杜甫在安史之亂以後，面對著劫後淒涼的長安，曾有「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的感傷詩句。如以弈棋喻世局，陳公洽當時在台灣便曾錯下了幾著棋，如今思之，還不是同樣的令人感慨不已。

這些錯下的棋，我在陳公洽離台後所撰〈台灣三年〉（見三十七年十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一文，曾經指出治理台灣必須認識台灣，就是對此而言。認識最重要的就是溝通管道，而陳公洽在台灣不但缺乏溝通的管道，也缺乏輔導的管道。輔導，乃是指對台灣同胞所缺的民主政治的認知，未能作適當的輔導。我們都知道民主政治，絕非一蹴可幾，發展必須有它的歷程。群眾必須透過長期政治教育的洗禮與涉練。當時大家都從被統治的殖民地跨進了民主的藩籬，不懂民主的定位在那裏，真諦又在那裏，這是有賴政府所施的教育與輔導，始能帶領他們趨向正途。但是，政府無此之圖，也無此具有前瞻性的概念。缺乏輔導的負面，就是放縱，任其所爲。此中尤以不負責任的報紙言論與報導，爲害最烈，對於缺乏判斷的基層群眾，最具有蠱惑性與破壞力。當時那種跡近潑婦罵街的評論，風格極爲低劣，從無出於肺腑的真誠之言。有人認爲這種潛意識的反抗，是殖民旗幟下久遭壓榨之後，失去理性的變態行爲，雖美其名爲言論自由，却像一把燃燒著的烈火，燒到那裏，禍到那裏。政府任其到處燃燒，從未加以約束。二二八事件，盲目無知的群眾，背後便被這種火在燃燒著。這是我在前兩文中所未提到的。所謂水可載舟，亦

可覆舟，我們所見的就是覆舟的驚濤駭浪。

(二)

至於溝通的管道，一為與機關團體之間的有形管道，未能充分的運用。一為與民間領袖之間的無形管道，都因未能消弭隔閡，觀念偏差，鑄成大錯。前者管道有三：一為前閩台監察使現任總統府資政楊亮功方面，一為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故主任委員李翼中方面，一為台灣省參議會故議長黃朝琴方面。楊亮功望重學壇，老成謀國，還是相當受陳公洽的尊重的，但楊氏多次所提關心民瘼的興革意見，並未被接納。後來楊氏或因對此失望，或因了解他的固執性格，空言無益，便不再以獻言自貶。其次李翼中，他在陳公洽的心目中恐怕僅屬後輩（當年先總統 蔣公對他稱為畏友，故周總長至柔亦以晚稱，自高可知）。黨政之間，如能同心協力，患難相扶，自然有裨省政的推展，事實則不然，陳公洽唯我獨尊，一切冀以一元化，於是形成南轅北轍的局面，極不協調。執政黨之在各省設黨部，當初取向並非專為擴展業務，亦望以此能為地方政府產生輔弼與制衡的作用。當時黨政各持己見，視為異路，遑論以黨輔政。陳公洽離台後，李翼中則改任為魏道明主政的省府社會處處長。至於黃朝琴，雖為陳公洽所提攜，榮登省參議會議長之席，却以後輩自居，如欲真正能為台灣同胞的喉舌，下情上達，似乎還是渺不可及。所以，政府與民間的溝通管道，光復之初，始終如有一道迷惘的網存在著。這是需要突破，黃朝琴並未以此自任。

(三)

再說政府與民間領袖之間的隔閡，癥結在對台灣光復以前實際情形缺乏完整的資訊與深入的了解。如果認為曾受日本重視或任用的人，都是視如漢奸，這是有失公允。這種觀念，只有對過去身歷其境的人造成傷害，而對政府也只有憑添無謂的糾紛，於事無補。須知日本統治五十年，這是清廷喪權辱國的結果，與台灣同胞何尤，台灣同胞生於此，長於此，不可能不與日本政府接觸，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所以，三十五年光復致敬團前往南京致敬時，團中有識之士便曾向政府陳情，聲稱懲治漢奸條例並不適用台灣。黃朝琴雖以議長之尊，對此似未能為台灣父老化解政府所存在的隔閡與偏見。於是，如台中望族林獻堂（一九五六—一八八一），他雖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年高德劭，台灣同胞奉之如泰山北斗，仍未為政府所借重。追溯日據時代，林氏便與梁啟超、戴季陶諸氏都有往來（晤梁於一九〇七年，晤戴於一九一三年，都在日本），梁氏於一九一一年來台，就是住在台中林家的萊園（嚴前總統靜波為台灣長官公署財政處處長時，二二八避亂亦在此），感懷國事，梁氏曾賦詩以見志。梁、戴二人晤面雖相隔五年，但他們對台灣同胞被壓迫所持的意見，則為相同。都認為當時祖國尚無力量協助台灣爭取自由，台灣同胞不宜輕舉妄動，以免無謂犧牲，不如先與日本顯要厚結，藉以牽制台灣總督府，勿使台灣同胞受苦。所以，林氏從事民族運動，始終秉承溫和理性的路線，這是與梁、戴二人的建議是有關的。這種苦心，並未為陳公洽所察。回想早年那些領導人物，他們雖具有民族情操，如不顧現實情勢，堅欲與日人決絕，其結果恐怕只有像梁、戴二人所說的無謂

犧牲。所以，光復後絕不能憑日據時代的一切取以褒貶人物，更不能視同漢奸。林獻堂在光復後有兩件事頗為不滿：其一，三十五年，由丘念台奔走所組成的台灣致敬團，前往南京致敬時，陳公洽反對由林氏率領，理由是他曾任日本貴族院議員，後來允以不任團長，始告成行。其二，同年成立台灣省臨時參議會，原為政府重視民意的德意，不料議長一職，却捨台灣眾望所歸的林獻堂，而厚植黃朝琴（一八九六—一九七二）。黃氏當時為外交部台灣特派員，並受命出任首任台北市長，未及半年，因與我同機於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抵台，相知頗深。他雖愛國愛鄉，學養與領導才能皆為我所敬佩，只可惜離台太久，一向都在外交部任職，過去那段悠長的歲月，對國家雖有貢獻，而在台灣却是一片空白。台灣同胞當時不免因當地碩宿未被重視而產生失落感。此事據聞係出於長官公署民政處處長周一鶚的安排。

(四)

三十五年春，中央社台北分社成立，林獻堂關心政局，知道昔日日本同盟社的業務，都由中央社賡續，認為中央社可以向政府獻言，於是，我以分社主任的身分，曾被邀宴於現在博愛路稱為「麗都」的日本餐館。他長我三十多歲，我以長者視之，因不能說國語，一切都由辜偉甫代為翻譯。後來我也曾邀偉甫前往台中霧峰拜望，每次談話，都見此老意興風發，頗有總攬群倫的氣概，愛國情懷，溢於言表。他有若干與建設地方有關的建議，希望我能代為向陳公洽轉達。我則希望他能常駐台北，因為台北為政治中心，冠蓋雲集，不致遠離各界人士。如論年齡資望，

他確為台灣光復後身歷興亡僅存的耆舊，清廷割台時，他已十五歲。所以，如板橋望族大老林柏壽（一八九五—一九八六）與黃朝琴諸氏在他的眼中無疑的還是後輩。如此老成碩望的人物，長官公署如視為與漢奸同流，對他實為莫大的侮蔑。幸而這層陰霾因長官公署的改組隨而消逝，魏道明主持省政時，便聘為省府委員，並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陳辭修繼任省主席，仍聘為省府委員，並兼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大陸危急，台灣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他的動態，頗為各界所注目，時局既不穩定，對他便有各種出於不了解的揣測與謠言。雖不像范仲淹所說的憂讒畏譏，但關懷時局，前途未卜，心情的確相當的複雜苦悶。於是，三十八年秋，便偕觀光團前往日本，自稱治療頭眩宿疾，從此久客不歸。滯日期間，並以居處自署為「遁樓」，以明心跡。政府方面則仍不斷的派人或馳函致意，望其早歸。如三十九年吳國楨主持省政時，仍聘為顧問，並託人勸說回台。台灣銀行前總經理瞿荊洲訪日時，亦往勸駕。四十年，行政院院長陳辭修與吳國楨都曾去函敦促，嚴靜波、彭孟緝、楊肇嘉諸氏到日本時，都曾先後前往勸說早日回台。是年，林氏關心國事，且曾上書先總統 蔣公， 蔣公在覆函中語多懇切，尊稱為先生，盼其早歸。但都未為他所接受，於是，無論在台、在日都有各種的流言，毀譽互見，也有對他是中傷與不諒解的。

董顯光（一八八六—一九七一）出使日本時（一九五二—一九五六），為期朝野團結，共濟時艱，也曾希望促使林氏早日回台。當時經過未為外界所知，特為追記在此。時在四十二年夏，董氏回國述職，其老友中央社故社長蕭同茲，設午宴於寓所為他洗塵，同席有連震東、魏景蒙、辜偉甫及我，共六人。董氏為新聞界前輩，也是我的證婚人，席間談到

林氏在日情形，很像台籍人士在日的據點，若干不滿政府或主張台獨的人，與他接觸頻繁，而且因觀點的偏差，造成他對政府的隔閡與誤解。董氏愛國情殷，認為應該勸他早日回台，且以勸駕的人，林柏壽為最適當的人選。因知與我有親戚的關係，便邀我約定時間同往林府拜望。行前且問我怎樣的稱呼，我說我是晚輩，以「四叔公」稱之。不料此老不但風趣，且極謙虛，也跟著稱四叔公。可惜此行並未如願以償，因為林柏壽認為林獻堂滯日不歸，心情孤寂，雖關懷鄉土，關懷台灣政局，但在內心却充滿了解不開的失望情結，鬱鬱寡歡，有些流言，並不是他願意回台解釋，或向社會交代。後來行政院故政務委員蔡培火又銜命赴日勸駕，林氏雖以親筆函覆當時總統府張秘書長岳軍，表明心胸磊落，但仍未回台。不久，他的胞弟次子相繼去世，客老異邦，情所不堪。四十五年，便以老病在日作古。此時張曉峰（其昀）已出長教育部，為紀念林氏一生富有民族思想，特建獻堂紀念館於台北市植物園內的南海學園，至今儼然尚存。惟館名已無人能識，因久為孔孟學會等機構所借用，人事滄桑，空留浩歎。

追溯陳公洽當初錯下的幾著棋，未免為歷史留下了無可彌補的遺恨。如果台灣光復之初，林獻堂與其他的地方士紳，政府都能加以禮遇，重視他們對桑梓所作的貢獻，借重他們的人際關係與才智，為政府所用，共同促進台灣的建設。台灣所見的和諧團結，恐將早有另一番祥和的氣象，林獻堂可能便不致自我放逐，老死異邦。歷史始終未能為人間寫下完整的光彩一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從歷史中如何的汲取教訓與經驗，這是我們後來的人應有的省思罷。

(原載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

誰知明月照溝渠

——二二八事件四十五周年感言

歷史雖不會重演，但歷史所帶來的教訓，有時真令人有椎心瀝血之痛，因為那是無法挽回的千古遺恨，留與後人的也只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感嘆。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例，這是四十五年前遙不可及的往事，當時很像天空突然飄來的陰雲，一陣狂風暴雨以後，為人間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災難，至今仍存在著一團模糊不清的陰影。當此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已告結束之際，感懷今昔，想到這團模糊的陰影，以我這樣身歷其境的人，很想為這團陰影再作一次的釐清。

為何選派陳儀來台主事

談到二二八事件，陳公洽（儀）似是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政府為什麼會任命他為台灣行政長官，擔任光復台灣的大任。追溯當時的情形，如果瞭解實情，並不意外，因為以陳公洽的經歷來說，似乎很難找出比他更為適當的人。他是早期留日成績優異，不但深諳日本政情，也是與日本政界頗多舊識，民國二十四年且曾應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之邀，來台參加治台四十周年博覽會，對台亦有瞭解的人。在當時政府高層次的袞袞諸公中，朝野都一致認為他是有理想、有作為與有擔當的人。但是，卻忽略了他有剛愎自用，主觀性極強的一面。當他擔任福建省主席的八年

中，雖因僑領陳嘉庚強烈反對他的財經政策失當，政府爲求順僑情、重團結而離去，談福建的建設，包括反對的人在內卻無法否定他在福建所留下的功績與貢獻。所以，當政府發表他主台的任命時，各界都寄以厚望，這是事實，不料爲時僅一年五個月，便以二二八事件黯然掛冠而去，各界都感到非常的驚愕與意外，這也是事實。

在他主台未滿兩年的時間中，何以由極端的希望而變爲失望，何以由熱情的擁戴而變爲排斥，最明顯的失敗，今日思之，有些因素值得我們的省思：

一元化治台措施種惡因

第一，一元化的理想，遺恨無窮，——陳公洽重視科學，也重視民主思想，在當時政府的官員中還算是開明進步的。但是，他主政台灣卻一味的講究一元化，似乎與他的思想有些相悖。在他的心目中，台灣無論什麼機構，最高的主管，當然就是長官公署，他就是決策人。除了兼任警備總司令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之外，任何中央機構也希望歸屬於他的指揮。自然，這是無法兌現的雄圖大略。所以，他不願意中央機構在台設立分支單位，從駐軍、到銀行、到傳播媒體，他都希望貫徹他的一元化理想。因而，當三十五年先總統 蔣公蒞台移駕日月潭時，詢問他台灣的駐軍可否調遣大陸參加戡亂戰事，他便滿口答應可以全部調走。雖然他有感於當時駐軍軍紀配備都不如理想，未爲台灣同胞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是，他很想培養台灣的保安部隊，用以維持治安，也是事實。無疑的，這是一項錯誤的估計，它的後遺症，就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發生

後，政府捉襟見肘，無力來維持地方的治安。又如當初交通、農民銀行等機構欲來台設立分行，亦未為陳公洽所同意。中央日報當時在各省都設有同樣的機構，在台幾經波折才勉強的改以中華日報名義與讀者見面，而且地點不在台北，設在台南市還是借用新生報的設備的。他的理想，銀行只要台灣銀行一家便夠了，報紙也只要省營的新生報一家便夠了，其他機構，亦復如此。陳公洽這種固執的觀念，或許出於求治心切，希望台灣的政績，不受當年大陸混亂情勢的影響。但是，結果卻是負面的，他成爲一個獨夫，獨行獨斷，被合衆社記者謔稱爲「台灣之王」，長官公署也被認爲是令人可憎的日本總督府的替身。這些誤解，自然都由陳公洽的作爲有以致之。再說，如閩台監察使台灣辦事處，執政黨省黨部等機構，陳公洽基於一元化心態的作祟，都持以距離，無法與他們合作爲建設台灣而努力，更談不到臻於水乳交融的境界。監察使楊亮功老成謀國，對光復後的台灣應興應革事宜，雖曾多次向陳公洽獻言，陳公洽始終以言詞敷衍，而不見之實際的行動。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對陳公洽來說，還是後輩，他亦未能充分運用這樣的管道參與省政的建設。像這樣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個性，怎得政通人和，怎得不失敗。

治閩用人不當在台重演

第二、治閩前車之鑒，未加深省，——陳公洽治理福建雖有功績，但並不是光榮的引退，這些失敗教訓，他並未加深省。他在福建時，施政的重心，很多措施都是出於徐學禹、沈仲九兩人的意見，財經政策的失當，就不能不歸咎於徐學禹的策劃，後來福建各界的反彈，成爲他掛冠

的主要原因。但他在主台首次所發表的各處主管名單上，徐學禹（公署第一任交通處處長）的名字赫然仍在，後來因陳嘉庚等人的反對，指稱閩台一家，政府主管豈能仍以治閩的老班底，而無一人是閩台人士，徐某才到招商局去當總經理。我們如加細察，台灣光復之初一切的財經措施，仍然隱約的留下了徐學禹的影子。而陳公洽在台爲人所詬病，財經政策的失敗，實爲其關鍵所在。至於沈仲九（公署顧問），雖居幕後，很多決策，此人還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陳公洽卻深信不疑，認爲是智囊團首屈一指的人物，不但主台，後來主政浙江，亦復同出一轍。據聞陳公洽所定罪的局部和平，就是沈仲九的策劃。我們讀左傳都知有「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之語，他在陳公洽的左右不但不去，反而陷陳公洽昧於大義，成爲歷史罪人。識人之難，往往鑄成千古遺恨，能不感慨。

雖重民意卻未明察民瘼

第三，重視民意而不知民瘼，——陳公洽當初愛台灣，也愛台灣同胞，從他的望治心切，當無疑義。但結果適得其反，兩千多年前，管仲所說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陳公洽在這個「順」字上表現得很差，他雖重視民意，但是遠離民衆，民衆需要在那裏，苦痛在那裏，他居高樓之上，築了隔閡之牆，牆外正確的資訊，全然不知。部屬既乏忠直之言，他自己又剛愎自用，固執成性，治閩那一套辦法，早已失去了效用。民間有志報國的知識分子，及當地具有影響力的人士，都未獲得應有重視，而社會基層所暴露的失業、物價高漲、生產停頓、物質貧乏等一連串問題，又缺乏解決困難的對策，民怨沸騰，政府似乎只有坐視其

變，從未聞加以疏導或溝通。於是，由希望變成爲失望，由擁戴變而爲排斥。終於涓涓之水，匯而成為大川，氾濫成災，無可遏阻。「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翻閱歷史，古今無不如此。

放任言論孕積潛在風暴

第四，言論自由，反而對政府造成傷害，——台灣社會從被統治到民主自由，這是有一段要走的路，陳公洽只知讓人民享受民主自由，有異於被日本統治的生活，卻忽略了民主自由的真諦應先讓人民去了解。所以，民間報紙言論的自由，政府很少加以約束。這些言論，以正面來說，可以了解大眾的心聲，作爲施政的參考，自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但在負面，這些言論，如爲具有政治野心者所操縱，造成人民對政府的離心力，自然是十分堪虞的。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主管雖爲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但相當放任，絕不像日據時代的嚴加管制，這種現象是台灣同胞前所未見的。於是，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只見壞的一面，不見好的一面，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這種傷害，與當年大陸政府被反對者的誣蔑宣傳，所產生的錯覺，極爲相似。因爲對政府已存有不信任的心理，公權力自然受到了輕視。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爲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綜合以上所述，陳公洽是行政長官，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自然應向歷史

負責。這種不幸事件，一言以蔽之，還是與他的剛愎自用，阻塞溝通疏導的管道有關。光復後的台灣，這是舉世矚目的地區，從大陸到台灣，從廟堂到社會各界無不對他寄以殷切的期望，而他的作為，無論出於怎樣的愛台灣、愛台灣同胞，還是令人失望。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當他離台的前夕，曾約我去公署作了近兩小時的長談，結論是「政治太寬，經濟太緊」，因此演出這場悲劇。記得三十七年我在上海大公報撰文，慨乎其言的指出「治理台灣，須先認識台灣」，所感亦實在此。昔人詩云：「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徒留後人無限的遺恨與感嘆。

離台慨嘆政寬經緊之誤

當年先總統 蔣公雖遠在南京，但對事件發生後，十分的關切，接獲各方報告後，決定派軍來台，並以手諭陳公洽：「請兄負責應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當時陳公洽雖飭屬徹底執行，然事實上其部屬仍不免陽奉陰違。如今政府為安撫所有受難家屬，消弭歷史陰影，一年前，行政院秉承李總統登輝先生的旨意，特邀學人及有關人士組成研究小組，以一年時間廣向海內外蒐集有關資料，調查當時實況，撰成約一百萬字之長篇報告，公之於世。並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決定成立建碑委員會於台北市建立紀念碑，由邱資政創煥為召集人，受害人林茂生教授哲嗣林宗義博士為副召集人。國家元首重視之情備矣，其見於歷史意義豈止於賠償致歉所能比擬？我們希望從此台灣所見的是一片清朗的海闊天空，充滿祥和之氣。（本文作者現任行政院二

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召集人)

(原載八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國時報)

初履斯土

(一)

今年十月五日是我到台灣四十周年的紀念日，回想當時的情景，無不歷歷在目。

台灣從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爭以後，忍辱割讓日本，以迄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前後共歷五十年。割地之初，李鴻章曾經老淚縱橫，沉痛地認為這是傷心之地。像這樣淪於異族的統治長達五十年之久的祖國山河，因戰勝而重入版圖，誠然為多難的中國歷史，憑添了光榮的一頁。

當時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搭乘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借用美軍的專機，由重慶先經上海而後直飛台北。五架專機共乘五十多人，都是首批進入台灣的人員。一路上撥雲排空，橫跨了半個中國，從浩蕩的長江，越過長江兩岸的重巒疊嶂，然後飛越波濤澎湃、一望無際的東海。每人都在翹首以待的擁著滿懷的振奮情緒，這不是杜甫感嘆的「劍外忽傳收冀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劫後餘生，而是涵蓄著雄壯、激昂、豪邁、歡躍，與充滿希望的多種情愫。彷彿置身神遊於那個光芒萬丈、舉世矚目的開國年代。那種境界，真為勝利後千萬人所嚮往。

當台灣的土地在微茫的雲層下逐漸地出現時，我們都如對一個音訊隔絕

而從未晤面的親人，乍然相遇，不禁淌下熱淚。

(二)

台灣，遠離祖國五十年的台灣，終於在我們的眼底出現了。

當我們的專機在台北的松山機場降落時，剎那之間，我們的感覺，與初履日本國土沒有什麼差異。滿眼的日文，滿耳的日語，大街小巷的木屐聲。日本的殖民政策，雖將台灣經營成為日本國土的一部分，但同樣的也像他們的軍國主義為亞洲帶來了災難，殘酷的戰爭，便在這裏遺留著怵目驚心的劫後創痕。我們下機以後，只見遍地瓦礫，滿目荒涼，萬目睽睽的總督府，僅存殘垣斷壁；那個被台灣同胞視為劊子手的警務局，也被盟機炸毀，已經夷為平地（即今總統府前廣場）；多少建築，都是百孔千瘡。

我到台北後，首先須突破生活與言語兩道陌生的屏障，處境雖如孤軍奮鬥，但時時未忘我所肩負的重擔。因為全國朝野都在關心著台灣，全國朝野都在等待著我所報導的台灣消息。當時我未攜帶發報機，也沒有電務人員隨行，幸而事前已獲得空軍的支援，一切電訊都可由張廷孟所率領的先遣人員在松山所設的電台轉發到重慶，再由重慶空軍總部送到中央社總社發播。所以，我到達台北後的次日，全國各報便已迅速地刊出我所報導的電訊，而國內的親友們也獲知我已到達睽違五十年的台灣了。

當時除積極的報導台灣光復的各種動態外，尚有兩項任務肩負在身：一

為接收日本同盟通訊社台北支社，一為籌備成立中央社台北分社。同盟社雖經行政長官公署決定由中央社接收，但該社舊址已被盟機炸毀，蕩然無存，其地即今博愛路東方大飯店的對面。所以，除了數十名員工尚待遣散之外，已經名存實亡。員工中後來有台籍的雷樹水、蔡遠烈等五人，也加入了中央社外勤、內勤的行列。當時幾經波折，始覓得位在後來西寧南路二十號的當時木材會館，權充辦公處所。翌年（三十五年）二月廿五日中央社台北分社成立於此。大陸淪陷，中央社總社遷台，也是設辦公處於此。如今，樹水兄也已白髮盈頭，歲月催人，能不令人感慨。

（三）

當時前進指揮所人員到達後，次日便在總督官邸（即今台北賓館）舉行第一次富有歷史意義的升旗典禮。至十月二十五日，便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從此台灣正式重入中國的版圖。典禮隆重而簡單，台灣耆舊如林獻堂先生等都被邀參加。

當時的台灣，慶祝光復到處都有如火如荼的高潮，大街小巷，人潮如湧，有的扶老攜幼，為重見漢官威儀而手舞足蹈，有的慨話當年，為復睹故國旌旗而感激零涕，物質雖缺，仍可看到到處都在掛燈結綵，與富有中國色彩的牌樓。國旗更多，大的、小的、掛的、豎的、手裡擎的，也有誤被倒置的，與各人臉上的笑容，相映而成的普天同慶的畫面，比什麼精彩的報導都來得真切而動人了。其他如舞獅、高蹺、歌仔戲、傀儡戲，也不時的在鑼鼓聲、爆竹聲、歡笑聲中交錯的出現，任何慶典，

無此盛況。後來有人說，光復之初，有兩種行業，大發利市，一是爆竹商，一是國旗商。國旗在日據時期是無人敢出售的，相反的，此時的日本太陽旗，已經黯然無光，被人不屑地淪為包袱等物的代用品了。

不但如此，街頭巷尾，只要有書店或文具店，都可以看到翻印的論語、孟子、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幼學瓊林之類的通俗古籍，大量地出售著。日據時期，中國古籍，台灣雖有不少人在熟讀著，但不是公開的。而今台灣重光，這些書籍便像撥雲見日似的陸續出現了。雖以限於物質條件，紙很粗，錯字也難免，但台灣同胞嚮往祖國文化的熱情，確是十分可貴的。此外，到處還可看到國語補習班的招牌林立，這種情景，頗與今日滿街的英語補習班相似。當時很多不稱國語，而稱北京話。台灣同胞雖有不少熟讀中文的人，他們僅限於閱讀或寫作，講是很生硬的。光復後，他們無分男女老幼與貴賤，朝朝暮暮，都在孜孜不倦地學習著。這種精神，自然出於對祖國的向心力。

所以，日本雖在台灣統治了五十年之久，他們所能改變，只憑炫耀於外在的形式。台灣同胞內在的民族精神，就與他們身上所流的血液一樣的是永遠無法改變的。譬如過去日人都稱中國為支那，隱含輕蔑之意。當我在日人尙未遣散時去參觀小學，便發現有學生對日籍的教師提出嚴正的抗議。他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我們，你們現在不能再稱我們什麼支那了。」那幾句話，真是令人感動，擲地有聲。

當時台灣各城市被盟機轟炸以後，市面都很蕭條。台北如後來的博愛路、衡陽路等地區，為日商所聚居，尤其被炸得十室九空。各地物資都是十分的貧乏，有些日用品雖能勉為應市，品質都是非常的低劣。其中

最難見的、最缺乏的是銅鐵之類所製的用品，可能因應戰爭所需，已被日人搜刮殆盡。煙酒雖有公賣局供應的產品，光復前的品質，也極為低劣，尚不如大陸各省的土產。只有台灣所盛產的糖與各種不同的水果，點綴在冷落的市面上，光彩奪目，為初履斯土的人帶來了一些新奇感。服裝方面，男士們高級一點的只需黑白兩套西服便可在四季中周旋於酬酢之間，較之大陸寒暑分明顯見簡便得多了。女性也是簡樸可喜，幾套洋裝，足夠更替。她們都有刻苦耐勞的美德，不少因家累而出外謀事。街頭巷尾另有一種特殊的劫後景觀，就是到處都有日人所擺的舊貨攤，他們都因台灣光復，無法繼續居留，政府必須以日僑的身分遣送他們回國。而且所攜的財物，也是被限制的。所以，他們都需儘量地變賣其所有。那些舊貨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都是被塵封已久，而且已失去原有的光彩的舊物。前面守著沉默的老人或婦人，其中不乏是身世淒涼的陣亡軍人的遺孀，他們只知變賣，也不知其應有的價值。因而若干曾被珍藏的中國書畫，也盲目地被淪為論斤估價的廉價品了。這是日人窮兵黷武所留下最悲慘、最辛酸的陰影。他們變賣其所有以後，便陸續地被遣送回國。他們雖是戰敗國的國民，但其所表現的守法精神，卻不能不令人加以重視。其中如一受僱為傭的老婦，當天便須遣送回國，但是她仍能如平時一樣的為主人做了早餐，然後黯然告別。其事雖小，卻顯示他們心目中所矜持著的守法觀念。又如我在基隆看到他們在風雨交加中列隊登輪，臉色凝重，一語不發，秩序仍然不亂，所攜的財物，既不超量，也沒有私藏，更沒有吵吵鬧鬧或亂哄哄的現象。如今，他們終於在戰敗的廢墟中自力更生，振興他們的國家，誰也不再蔑視他們。這是關係一個民族有沒有組織能力的問題，也是國民教育水準的問題。逝者

已遠，言念及此，願我們國人都能自加深思與反省。

(四)

當時從大陸來台的接收人員與台灣同胞相處的確如水乳交融，十分和諧。只要接收人員足跡所到之處，他們無不竭誠的歡迎與接待，那種出於內心的真摯情感，坦率而親切，如逢久別的親人，或問字，或學習國語，或探詢大陸的情形，雖因辭不達意，表現得木訥一點，但從來沒有隔閡。最有趣的統計，就是光復後的一年，彼此通婚的人數，根據新生報的報導，已經超過了五十年來台灣小姐下嫁日人的總數。這些男士，多數是政府年輕的基層人員，他們不一定都能說閩南語，但都樂於學習。如今，他們的兒女，屈指也已經早過而立之年了。

日據時期，日人在台的一切措施，本質都是以殖民為主，自然逃不了殖民地政策所賦予的桎梏。所以台灣同胞的生活，沒有自由，沒有平等，只有歧視，只有管制。他們與日人界限分明，純然是屬於兩個世界的人。光復後，政府當局求治心切，希望台灣的政治是民主的，是開放的，社會是自由的，是平等的。舉凡殖民地政策所留下的各種約束，一律予以廢除。最明顯的，如日人過去拘禁在火燒島（即今綠島）的囚犯，全部釋放，恢復自由。如為改變台灣同胞對政府的形象，一掃衙門的陋習，行政長官公署先為表率，不設門警，可以自由出入。又如生活必需品如糧食等物，廢止日人所設的管制，可以自由買賣。當時的反應，我們無可否認的是：台灣同胞因受日人五十年的長期統治與壓榨，對光復後的政府無不寄以過高的期待，慶祝光復所表現的高潮，便是出

於積鬱過久的情感傾洩，以為從此政府是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可以情感化的寄託於政府，什麼疑難也不會再存在或產生了。這種現象，自然談不上對民主與自由的認識。殊不知真正的民主與自由，都有它的範疇與真諦，決不是一蹴可幾，立竿見影，而是需要先經過政治教育的薰陶，與適當時期的培養、涉練。也不是像失去母愛的孩子，一旦回到母親的懷抱，便可以任性的撒嬌。然而，當局既未注意到民主與自由在台灣都是新名詞，太缺乏基礎，對於那些存在於大眾心目中不正確的觀念與幻想，又忽略疏導或糾正的工作。加以當時大戰之後，台灣所見的是日人留下破損的殘局，經濟尚未穩定，便已面臨百廢待舉，政府的對策，自難迅速的收效。這種處境，台灣同胞並不是很瞭解的。於是，因觀念的偏差、幻想的難以實現，未免就產生各方的責難，演變而成為希望愈高，失望愈深。所謂「二二八」事件，便是在這種夾縫中激盪而成的風暴。因而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理想目標，也像突遭一陣風雨的侵襲，建設既未可成於朝夕，一切燦爛的遠景，其實現也只有待於後來踵其事者的努力與完成了。

(原載七十四年十月五日聯合報)

多少蓬萊舊事

台灣光復，今年是四十五周年，而我第一步踏上這塊土地，卻比台灣舉行光復典禮早了二十日，——這是因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便由重慶先偕前進指揮所的首批人員搭機抵台。遙想當年的情景，最令人難忘的還是台灣同胞慶祝光復的熱情，如波濤澎湃的掀起了萬丈高潮，翻騰整個台灣。像這樣多少蓬萊舊事，可惜無人能為歷史作見證。茲值紀念光復節之際，因特追記數則，其意不只為一澆懷舊的塊壘。

台灣的國旗故事

我們國旗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抗戰之初，如上海女童軍楊惠敏（已在台病逝），游過蘇州河，向困守四行倉庫的國軍獻旗，與後來從淪陷區逃到後方的人，當他們第一眼看到國旗時，都是流著熱淚。

台灣從日據以至光復，台灣的天空，五十年來，從來沒有中國國旗的飄揚。日本投降以後，台灣的天空，第一次飄揚著國旗，就是我到達台北的次日——三十四年十月六日的清晨，地點是在當時總督官邸，即今台北賓館，主持升旗典禮的人是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誦堯將軍。升旗在大後方只是生活中例行的簡單的禮儀。但在國土重光後的台灣，便有更深遠的意義了。當時牆外重重疊疊的圍滿著台灣同胞，他們仰望著國旗冉冉地升起飄揚於蔚藍的天空，正如大旱之見雲霓，幾至熱淚滂沱。趙子

昂在宋亡後沉痛地吟出「中原父老望旌旗」的詩句，就是同樣的寄以故國之思的情懷。

台灣同胞因熱愛祖國，當時他們共同所能表達的就是爭懸著國旗。國旗對他們是陌生的，但他們愛國旗，無論在那裏，都在爭先恐後地掛著、豎著，也有是倒懸著的，橫扣著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人估計，台灣光復之初，有兩種人都在發慶祝財，一種是鞭炮商，一種就是販賣國旗的商人了。至於昔日曾經充滿敵意的日本太陽旗，到此都已棄如廢物，也有人權充為包袱的代用品。不料四十多年後的今日，竟有人在焚燬自己的國旗，能不令人感慨係之。

台灣首次慶祝國慶

三十四年台灣首次慶祝國慶紀念日，離受降典禮尚有半個月，慶典是在台北公會堂（即今中山堂）舉行，代表政府的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後來長官公署的秘書長），稱病未出，主席却由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擔任，有點匪夷所思。黃氏致詞後，便由接管台灣新報，後來的新生報社長李萬居講話，他先用國語滔滔不絕地講完了光復的大義後，怕人聽不懂國語，又自任翻譯以台語複述一遍。李氏的國語頗具鄉土風味，聽來與台語同一調調，於是大家彷彿聽了兩次相同的講話，一時傳為趣談。

台灣日據時代的總督官邸，門禁森嚴，台灣同胞自然到此不能越雷池半步。日本投降後，對面的總督府已被盟機炸得面目全非，在落日的餘暉下，早已黯然無光，於是台灣同胞也大可以登堂入室了。

我們首批抵台人員，因都出入於總督官邸之門，台灣同胞便抱有一睹漢官威儀，以迎王師的心情。此一地區，經常遂有一羣一羣的人影聚集著、盤桓著。國慶日之夜，我們原在那裏預定二十桌酒席招待地方士紳，不料圍觀的人羣，愈來愈多，後來到處都是人。我們幾乎被擠得無立足之地，只好胡亂地果腹，才結束了這一次的盛會。這種情，這種熱，只有沸騰著國家民族之愛，始能見之。

台灣同胞的嚮往祖國，尙不止此。當時男女老幼競相學習國語，以能說國語爲榮。街頭巷尾，滿掛著國語或北京話補習班的招牌。這種情形，多少年後，雖替之以英語、美語的補習班，但論熱度，後者夾雜著功利的成分，顯然不如前者單純的出於至誠的愛國熱忱了。

黃朝琴的市長與關防

台灣光復後首任的台北市長是當時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受命之初，台北如在廢墟，百廢待舉，日人稱爲市役所的市府舊址，已爲行政長官公署所徵用（即今行政院）。公署理應設在總督府的舊址，無奈燬於轟炸，僅存斷垣殘壁而已。所以，黃氏第一件大事，就是找尋辦公地址，幾經奔波，才搬進了長安小學舊址，從此市府在那裏辦公，至今已歷四十六年的寒暑。

當時市府並無上級頒發的印信，於是市長大人便臨時找人去刻了一顆大關防，其狀較長官公署的印還要大一些，大概是不合規定的。這顆關防歷盡滄桑之變，也算是歷史文物，不知現在何處。黃氏蒞任之日，容光煥發，最先登上門前陽台，升起國旗，迎向朝陽，頗有一番新氣象。當

時我很榮幸的忝為市府第一名的賀客。

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黃氏出任首任議長，市長便由游彌堅接任。所以，他的市長，前後未及一年。對台灣的貢獻，當然以其主持省參議會及省議會協助政府的建設為主。至於後來將自己的住所擴建為國賓大飯店，又是生活的另一面見其光彩而已。

台灣禮失仍可求於野

日本統治台灣，在本質上，採取的是殖民政策，奴役人民，攫取物資。光復之初，台灣到處雖充滿著日本的情調，滿街是扭曲的日文招牌，與椰子樹下單調的木屐聲。但從深處來看，日本給予台灣的止此而已，能搬走的也只限於一些物資，台灣同胞的心，怎樣也是搬不走的。

以物資來說，戰時必需品的匱乏，不見於市面，只能從台灣同胞生活中去觀察。而且於市面最顯著的如銅鐵之類，如菜刀、鐵釘都已不易購得。當時大陸各省，雖同屬戰時，却未被搜括殆盡。

我們初履斯土，彷彿進入日本國土，但如到各鄉鎮或深入農村去走一趟，感受便完全不同了。我們無論到那裏，彷彿此身就是在福建或大陸各地的鄉間或農村。因為看到那些勤勞樸實的居民們，從他們屋內佈置與所供奉的祖先牌位、神像，以至風俗習慣，無一不是似曾舊時相識。那種真誠無偽，端莊有禮的言談舉止，更令人想到「禮失求之於野」的一句老話，誰信這是被異族所統治的土地。

日本戰前對中國慣以「支那」相稱，這是含有輕蔑之意。宣佈投降後，

我曾先去參觀若干學校上課的情形，學生中便有人反抗，認為我們已是戰勝國堂堂的國民，豈能再以此輕蔑口吻相稱。

記者風光與同盟社的爛攤

台灣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首批抵台的人員中，我們新聞界共有五人，計重慶大公報李純青、上海大公報費彝民、中央日報楊政和、掃蕩報謝爽秋與我，我是中央社台灣特派員。五人中以我最為年輕，如今其餘四人都已先後作古，只有我一人健在，有時真有「此身雖在堪驚」的感嘆。

我們五人最值得掛齒的就是同心協力為新生報寫社論，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文版的台灣新報，雖為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報，但光復後必須改為中文發行。社長李萬居單槍匹馬來接管，面對著中文主筆及編採都有才難之嘆，只好求助於同機來台的我們五人。

所以，新生報於光復節創刊後，暫時雖中日文並用，而中文社論不少就是由我們五人輪流來執筆的。其中以李純青寫得最多，出力也是最多的一人。他老家在台北松山，回台之日，不料尊翁竟同日去世。我們五人便將政府所發的日幣二十元，取其一半為奠儀。後來始知這份禮不算是輕的，因為如再加十元，當時便可買下在拍賣的半輛舊式老爺小破車了。

我的任務，當時除火速向全國報導台灣光復的消息外，還須兼負接管日本同盟社的責任。說到報導，隻身來台，赤手空拳，這份重擔，決不是可用文字傳真的今日所能想像的。所幸在重慶已承當時空軍總司令周至

柔將軍的支持，空軍在台北松山基地的電台，可將我的電訊稿，轉發到空總，再由空總轉到中央社總社，翌日電訊稿便可在海內外各報刊出。這種天衣無縫的配合，同行的斲輪老手是無法爭著先鞭的。他們雖有滿腹經綸，生花妙筆，因郵遞費時，海天遠隔，也只能在月餘之後以通訊特稿與讀者們相見。

至於日本同盟社，當年權勢煊赫，兼負核發新聞之重任。台灣支社舊址，即在今日台北市博愛路東方大飯店的對面，頗具氣派，不料戰時已被盟機炸成一片瓦礫場。我接管後，先後將日籍人員遣送回去，留用台籍人員中，其中以曾任觀光協會總幹事的雷樹水最爲突出，很多人都先後離去，而他却能堅守崗位，勤習中文，未改初衷。如今白髮滿頭，也已將近古稀之年了（雷君現已作古）。像接管這樣爛攤，何異無米之炊。中央社特派員辦事處至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改設爲台北分社，社址在台北市西寧南路二十號日本木材會館的舊址。後來中央社總社從南京隨政府遷台，已故社長蕭三爺（同茲）所率領的各路英雄，也在那裏會合。以迄五十三年遷入松江路新址，中間已歷將近二十年的多難歲月了。

（原載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報）